

# 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 跨政權下臺南第一富紳王雪農的出現 (1880-1905) \*

林玉茹\*\*

## 摘 要

晚清臺灣的砂糖貿易，由於消費偏好，逐漸出現安平糖大多輸往華中以北，而打狗糖進口至日本的現象。過去以來，卻較少注意糖出口地的差異，是否也讓臺南和打狗的糖商有不同的異族觀和國際觀，進而對於日本領有臺灣有不一樣的因應和經營策略。特別是 1870 年代之後，這一群親自到日本、香港進行跨國貿易的打狗商人，對於晚清臺灣商業文化所進行的改造及其歷史意義。其次，領臺初期，一直面臨漢人武裝抗日，而必須鞏固政權的臺灣總督府，與曾經親身體驗明治維新的臺灣商人又有何關係，也較缺乏關注。再者，臺灣是一個海島，商業貿易向來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是這群從事跨國貿易商人的經營策略和思想如何面臨傳統和現代交織的大時代變局；他們又如何變成臺灣總督府和地方社會之間的文化仲介，進而擴張事業版圖，提升社會地位，仍有待深究。

本文即以明治年間臺灣赫赫有名的糖商王雪農為例，試圖闡釋在臺灣割讓給日本、眾多商人巨族紛紛逃回中國之際，這群早在明治維新初期已經到日本進行貿易的糖商，為何以及如何採取不同的經營策略，擴展企業版圖，成為臺南重量級富紳。首先，說明國際貿易與商人去留選擇的關係；其次，論證為何王雪農選擇由打狗入主臺灣經濟中心、第一大城市臺南府城，以及初期事業的開展。第三，從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的角度，分析他如何迅速變成臺南第一富紳。

關鍵詞：陳中和、糖商、德昌公司、銀行、三郊、網絡

---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之一，計畫編號：MOST108-2410-H-001-029。又，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 2020 年 7 月 28 日本所演講與談人黃紹恆教授和與會學者提出眾多精闢的意見，使本文更為完整；葉爾健教授提供資料；涂欣凱、郭承書、許仟慈及徐仲杰等助理協助蒐集、整理資料，並閱讀初稿，修正錯誤，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0 年 5 月 25 日；通過刊登：2020 年 8 月 11 日。

- 一、前言
  - 二、國際貿易與去留選擇
  - 三、趁亂之際：由打狗入主臺南
  - 四、邁向臺南第一「豪富紳商」之路
  - 五、結論
- 

## 一、前言

從長時期歷史來看，蔗糖一直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出口商品。早在荷蘭時代（1624-1662），糖已經是出口大宗，日本則是主要出口市場。鄭氏王朝時期（1662-1683），臺灣砂糖大多銷往日本，在東亞海域聞名的「臺灣船」每年運載大量的砂糖、鹿皮至長崎貿易。<sup>1</sup> 直至清朝雍正初年，臺灣與日本的砂糖貿易才逐漸式微，出口市場轉往華中以北。<sup>2</sup> 1860年，臺灣開港，臺灣與日本之間砂糖的直接貿易再次興起。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眾所周知，臺灣變成所謂的「糖業帝國」，蔗糖仍是臺灣重要出口商品，直至戰後1960年代。

臺灣蔗糖的產地以南部為中心。晚清開港之後，蔗糖始終是南臺灣最重要的出口商品，<sup>3</sup> 影響地方經濟甚鉅。南臺灣的糖，大體上從安平和打狗兩個條約港輸出，出口市場卻不同，打狗糖主要輸至日本，安平糖則銷往華中以北。<sup>4</sup> 然而，

---

<sup>1</sup> 鄭氏時代赴日貿易的船隻，稱作「臺灣船」。朱德蘭，〈清康熙年間臺灣長崎貿易與國內商品流通關係〉，《東海大學歷史學報》（臺中）9（1988年7月），頁56-57。

<sup>2</sup> 林玉茹，〈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臺北）62（2019年12月），頁20-23。

<sup>3</sup>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23-32。

<sup>4</sup> 上野專一，〈臺灣視察復命書〉（1894年手稿本）（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第2號，無頁碼；大藏省理財局，〈臺灣經濟事情視察復命書〉（東京：該局，1899），頁213。

過去以來，大部分的研究，著重於重建晚清至日治時期臺灣砂糖貿易的變遷，<sup>5</sup> 或是討論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新式製糖會社以及糖業帝國的成立，<sup>6</sup> 卻較少關注清朝至日治時期，在政權轉變過程中，由於前述糖出口地的差異，是否也讓這群在臺南和打狗的糖商有不同的異族觀和國際觀，進而對於日本領有臺灣有不一樣的因應和經營策略，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晚清臺灣與日本的砂糖貿易，除了洋行之外，最受矚目的是最遲於 1870 年代由陳福謙（1834-1882）在橫濱設立、成為中華街兩大中心之一的順和行，<sup>7</sup> 以及之後繼承其勢力，以陳中和（1853-1930，順和行家長）<sup>8</sup> 為首及陳福謙家族組成的和興公司。順和行與和興公司大致上以打狗為大本營，再派遣職員至橫濱設棧。順和行、和興公司、陳福謙家族以及陳中和家族的研究，因此也較多。楊玉姿、趙祐志、張守真以及李佩蓁即關注順和行或陳福謙家族在打狗或橫濱事業的開展，李佩蓁也首度釐清陳福謙的弟弟陳北學（1840-1908）以府城和打狗為中心，兼做德記（Tait & Co.）洋行買辦，擴展貿易版圖到南臺灣、中國以及日本。<sup>9</sup> 不過，過去研究常常忽略 1887 年和興公司成立之後，順和行已經變成其橫濱支店，1890 年買威令（W. W. Myers）所說大半控制南臺灣砂糖出口的是和興公司，而非順和行。<sup>10</sup> 高淑媛則詳細地重建晚清從順和行到和興公司在砂糖貿易舉足輕重

<sup>5</sup>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高淑媛，〈洋人生產機械化與臺灣糖業：以橫濱的打狗糖為例（1870-1895 年）〉，《高雄文獻》（高雄）4: 3（2014 年 12 月），頁 7-25；陳計堯，〈人流、物流、金流：條約港體制下南臺灣與日本的經貿關係（1865-1895）〉，《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18（2019 年 11 月），頁 7-67。

<sup>6</sup> 有關日治時期糖業研究成果，從矢內原忠雄、涂照彥以來，不勝枚舉。久保文克、齋藤尚文、平井健介等均有專書，黃紹恆、柯志明……等臺灣學者著重於製糖產業、米糖相剋、糖業與地方社會關係的討論。

<sup>7</sup> 伊藤泉美，〈橫濱華僑社會の形成〉，《橫濱開港資料館紀要》（橫濱）9（1991 年 3 月），頁 5；趙祐志，〈「順和棧」在橫濱（1864-1914）〉，《重高學報》（臺北）3（2000 年 6 月），頁 202。不過，有關於陳福謙究竟何時在橫濱設立順和行，眾說紛紜。趙祐志引用伊藤泉美提供的資料，主張應是 1864 年。但這是 1973 年橫濱商業會議所所編《橫濱開港五十年史》的記載，本文採用高淑媛的說法。詳見：高淑媛，〈洋人生產機械化與臺灣糖業：以橫濱的打狗糖為例（1870-1895 年）〉，頁 16，註 19。

<sup>8</sup> 家長即掌櫃，對東家負責，管理商店業務。

<sup>9</sup> 楊玉姿，〈清代打狗陳福謙家族的發展〉，《高市文獻》（高雄）1: 2（1988 年 9 月），頁 1-19；趙祐志，〈「順和棧」在橫濱（1864-1914）〉，頁 193-211；張守真，〈「橫濱順和棧」產權轉承問題探討〉，《臺灣文獻》（南投）62: 4（2011 年 12 月），頁 368-392；李佩蓁，〈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國史研究通訊》（臺北）2（2012 年 6 月），頁 43-49；李佩蓁，〈國際貿易與臺灣糖商的轉型：以打狗陳福謙家族為例，1860-1905〉，《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Respectives》（萊頓）9（2015 年 12 月），頁 54-72。

<sup>10</sup> 例如，李佩蓁〈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頁 44）及張守真、楊玉姿的《陳中和新傳》（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14，頁 20）即如此。會產生這樣的狀況，主要是引用林滿紅翻譯的 1890 年買威令的

的角色、糖商和洋商的競爭與消長以及從日本市場的變化觀察清末臺灣砂糖的處境。<sup>11</sup> 以和興公司為事業根基，進而取代陳福謙家族變成打狗巨商的陳中和及其家族，則是最受關注的打狗糖商，戴寶村、趙祐志以及張守真和楊玉姿即有專書或專文討論。<sup>12</sup> 特別是，張守真和楊玉姿的近作《陳中和新傳》，蒐集大量中、日、英文的一手史料，重建陳中和的生命史，並釐清和興公司興衰過程，指出陳中和因在橫濱經商的經驗，主動學習新知，又有膽識和創新，進而仿用西方現代化公司制度。<sup>13</sup>

然而，除了陳福謙、陳中和之外，同樣來自苓雅寮（今高雄市苓雅區）的王雪農（1870-1915）是順和行、和興公司栽培出來，在日本橫濱長久經商和居住的糖商。<sup>14</sup> 他和東家陳中和都是親眼見識到日本明治維新的臺灣商人。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臺灣本地的仕紳、商人紛紛舉家搬回中國，王雪農卻反向操作，趁亂之際，回到臺灣，並一舉進入長期是臺灣政治、經濟中心的府城臺南，經營事業。之後，陸續成立幾個製糖會社，特別是最先糾集臺灣人資本設立著名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他更進一步振興已經散亂崩潰、臺灣最具有勢力的商人組織臺南三郊，成為三郊組合第一任組合長，<sup>15</sup> 周旋於總督府、地方政府以及地域社會之間。

正如黃紹恆的研究所指出，矢內原忠雄和涂照彥太過強調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臺灣本地資本的壓抑，而忽略日治初期臺灣人資本家仍有一席之地，<sup>16</sup> 王雪農即

報告（買威令〔W. W. Myers〕著、林滿紅譯，〈清末南部臺灣的蔗糖業〉，《臺灣文獻》（臺中）28: 2（1977年6月），頁137-142）。當時，林文誤以為H. H.是順和行，其實是和興公司。

<sup>11</sup> 高淑媛，〈洋人生產機械化與臺灣糖業：以橫濱的打狗糖為例（1870-1895年）〉，頁7-25。

<sup>12</sup>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從糖業貿易到政經世界〉（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趙祐志，〈日治時期高雄陳家的資本網絡分析：以企業經營與投資為中心〉，《臺灣文獻》62: 4（2011年12月），頁417-484；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

<sup>13</sup> 本書極力大量呈現相關史料，但包括順和行成立時間、在橫濱的經營狀況，卻常常說明不一致。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頁92、97。

<sup>14</sup> 王雪農，1870年10月3日出生，1876年讀書，1883年進入順和行工作，於1885年至1895年，共十年在橫濱順和棧學習米、糖商業。「王雪農履歷書」，〈紳章附與〉（191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2254004，頁314-315，「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10月5日，網址：<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詳見第二節說明。〔以下省略資料庫名稱、下載日期、網址〕

<sup>15</sup> 黃懷賢，〈臺灣傳統商業團體臺南三郊的轉變（1760-194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53-54。

<sup>16</sup> 黃紹恆，〈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23（1996

是代表性例子。領臺初期，一直面臨漢人武裝抗日，而必須鞏固政權的臺灣總督府，與曾經親身體驗明治維新的臺灣商人又有何關係，是較少被注意的問題。

王雪農最先提議設立新式銀行、創立商業學校，更經常在報紙、雜誌發表各種具有國際觀和現代性意義的商業思想，可說是跨政權之下第一代具有現代商業思想的臺灣商人。臺灣是一個海島，商業貿易向來是臺灣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是這群商人的經營策略和思想如何面臨傳統與現代交織的大時代變局，卻罕被關注。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指出，企業家及其屬下從事貿易活動是高度個人化的過程，企業史研究應該關注商人和企業家，從人的角度來觀察企業的活動空間，特別是長途貿易商作為文化仲介（cultural broker）的角色。<sup>17</sup> 王雪農如何透過跨國貿易，而變成臺灣總督府和地方社會之間政治文化和商業文化的仲介，也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

目前為止，並沒有針對王雪農的相關研究，<sup>18</sup> 即使日治時期的人物誌也有不少訛誤。<sup>19</sup> 不過，黃懷賢最先注意到日治初期在臺南三郊積極活動的打狗資本家，都來自陳中和的和興公司系統，並指出臺南商人因對日本統治感到陌生，而打狗商人透過對日貿易瞭解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商業和相關法規，因此得以與府城商人共同重建三郊。<sup>20</sup> 然而，其研究以三郊為中心，雖然已經釐清了王雪農如何復興三郊，但是王雪農在臺南事業的經營，特別是他如何迅速變成臺南第一「豪富紳商」，<sup>21</sup> 亦即不僅財力雄厚，而且是地方社會的代表性仕紳，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由於篇幅限制，本文先以 1905 年為研究斷限。理由有二：首先，1905 年，日俄戰爭期間，陳中和和王雪農由於判斷錯誤，向銀行融資大量購買砂糖，然而

---

年 7 月)，頁 85-86。

<sup>17</sup> 高家龍，〈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现状的三个挑战〉，收於張忠民、陸興龍主編，《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 5-6。

<sup>18</sup> 張宏謨最早注意到王雪農是臺灣重要糖商的地位，但篇幅甚短，沒有註明資料來源，且錯誤甚多。張宏謨，〈早期臺灣傑出的糖界名人：板橋林家、陳中和、辜顯榮、王雪農〉，《臺灣風物》（臺北）42: 4（1992 年 12 月），頁 59-71。

<sup>19</sup> 透過陳中和和王雪農履歷書以及檔案可以發現，日治時期編輯的人物誌、列紳傳、名鑑，不少記載往往不正確。例如，王雪農的出生年幾乎都錯誤。

<sup>20</sup> 黃懷賢，〈臺灣傳統商業團體臺南三郊的轉變（1760-1940）〉，頁 53-54。

<sup>21</sup> 「豪富紳商」一詞是 1899 年報紙指稱打狗當地的陳中和所用。〈門弟〔第〕增光〉，《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30 日，第 4 版。

日本糖價卻大跌，砂糖滯銷，而產生嚴重經營危機，<sup>22</sup> 影響此後事業發展。在此之前，臺灣紅糖貿易仍主要控制在臺灣商人和外國人手中，之後增田屋、安部幸兵衛以及三井物產等日商逐漸加入競爭行列。<sup>23</sup> 其次，1905年之前，王雪農的事業版圖以臺南為中心，達到鼎盛；之後，新式製糖業的經營受挫，連鹽水港製糖會社都由日資接手。他被迫重新整頓事業，進入另一階段的經營歷程，將另文討論。

總之，本文以明治年間臺灣有名的糖商王雪農為例，試圖從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的角度闡釋在臺灣割讓給日本、眾多商人巨族紛紛逃回中國之際，這群早在明治維新初期已經到日本進行貿易的糖商，為何以及如何採取不同的經營策略，擴展企業版圖。本文所謂的文化仲介一詞，意指政治文化和商業文化的仲介。以下首先分析國際貿易與商人去留選擇的關係；其次，論證為何王雪農選擇由打狗進入臺灣經濟中心、第一大城市臺南府城，以及初期事業的開展；再者，從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的角度，分析他如何迅速變成臺南第一富紳。

## 二、國際貿易與去留選擇

清代臺南長期是臺灣府府城、臺灣的政經中心，南臺灣的富紳大戶往往在臺南有宅地或店鋪，例如佳冬蕭家、麻豆林家以及北港資生號即是如此。<sup>24</sup> 因此，打狗糖商到臺南開店並不特殊，如順和行的陳福謙早在1860年代已經到府城創設邦記號，<sup>25</sup> 但本節要探討的問題是，1895年臺灣因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之際，為何臺南紳商紛紛回中國，且比例最高？反之，打狗商人王雪農卻為何選擇此時入主臺南？

<sup>22</sup> 黃紹恆，〈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頁111；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頁138-139。

<sup>23</sup> 黃紹恆，〈日本植民統治初期（一八九五-一九一二）における三井物産台北支店及びその砂糖交易に関する一考察〉，收於馬場毅、許雪姬、謝國興、黃英哲編，〈近代台湾の経済社会の変遷：日本とのかわりをめぐって〉（東京：東方書店，2013），頁286-301。

<sup>24</sup> 麻豆林家在今兌悅門附近有大批宅地，佳冬蕭家在臺南市有建物五筆，北港郊商資生號則在府城開張布店。2013年1月19日田野調查，「佳冬蕭家佐生公遺言書」，現藏於屏東佳冬蕭家。沈昱廷，〈清代郊行研究：以北港資生號為例〉，收於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校，〈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2007），頁119-122。

<sup>25</sup> 李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臺北）20: 2（2013年6月），頁48-49。

眾所周知，臺灣的糖產地以南部為中心，鳳山縣最多，其次是安平縣、嘉義縣。<sup>26</sup> 開港之後，糖的出口，除了從安平（臺灣府）和打狗兩個條約港之外，也從東港、笨港以及鹿港等港，直接用中式帆船運至華中以北各地。<sup>27</sup> 出口市場則由中國內地擴及日本、歐洲、美國以及澳洲，但 1880 年代中葉之後，因各種因素逐漸退出歐美市場，轉以中國和日本為主要出口地，<sup>28</sup> 且以輸出港來區分，大致分成打狗糖和安平糖，之後分別稱為「府玉」和「臺玉」。府玉是指從打狗運出的糖，臺玉則是從臺南輸出。<sup>29</sup>

雖然打狗糖和安平糖都是粗製糖，卻因土壤差異，品質不同。打狗地區所產的甘蔗，因土質適合而品質優良，糖粗大，所含的結晶較多，商業價值較高，大獲好評，安平糖則質地較細。日本人即偏好糖蜜較多的打狗糖，而不喜歡安平糖或「府白」（臺灣府白糖）；相對地，中國沿海各地，南自福州北至天津、牛莊，卻偏愛安平糖。<sup>30</sup>

由於打狗糖主要輸往日本橫濱，也促使兩地之間於糖季時，首度出現定期輪，打破過去定期輪航線僅及於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現象。<sup>31</sup> 儘管 1880 年代中葉之後，臺糖在日本市場受到香港火車白糖的激烈競爭，<sup>32</sup> 但根據 1887 年領事報告記載，原來運糖至日本都是使用西式帆船 (sailing-vessels)，因日本市場比之前幾年越來

<sup>26</sup> 史久龍原著、方豪校訂，〈憶臺雜記〉，《臺灣文獻》（臺北）26: 4/27: 1（1976 年 3 月），頁 5。

<sup>27</sup> 根據 1888 年領事報告，南臺灣的紅糖，48%從安平和 52%從打狗兩個條約港出口。‘Report on the Trade of Taiwan for 1888,’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ume 4: 1886-1893 (Slaugh, U. K.: Archive Editions Limited, 1997), p. 240；林玉茹，〈由「尺素頻通」看晚清寧波、泉州及臺灣的三角委託貿易〉，收於鄭永常主編，《東亞海域網絡與港市社會》（臺南：里仁書局，2015），頁 474-475。

<sup>28</sup>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18。

<sup>29</sup> ‘Report on the Trade of Taiwan for 1888,’ p. 240；〈本年糖況〉，《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3 月 12 日，漢文報第 6 版。

<sup>30</sup> 1890 年，買威令 (W. W. Myers) 首度指出這個現象，直至日本領臺初期，也是如此。買威令著、林滿紅譯，〈清末南部臺灣的蔗糖業〉，頁 138、140-141；牟田豐，〈臺灣起業案內〉（東京：交通學館，1896），頁 161、163。1890 年，四分之三運到天津、芝罘，其餘則往上海、寧波以及牛莊。

<sup>31</sup> 1870 年代中葉，臺灣開始與香港、華南各地建立定期輪船航線，但往日本航線則更晚。晚清臺灣輪船航線的變化，參見林玉茹，〈通訊與貿易：十九世紀末臺灣和寧波郊商人的訊息傳遞〉，《臺大歷史學報》（臺北）58（2016 年 12 月），頁 169-170。

<sup>32</sup> 高淑媛，〈洋人生產機械化與臺灣糖業：以橫濱的打狗糖為例（1870-1895 年）〉，頁 7-25；黃紹恆，〈日本植民統治初期（一八九五-一九一二）における三井物産台北支店及びその砂糖交易に関する一考察〉，頁 281-282。

越有利 (favourable)，糖季時，打狗與橫濱之間開始有一艘定期輪船往來。<sup>33</sup> 直至 1894 年，雖然每年仍有少數安平糖運到橫濱販售，<sup>34</sup> 價格比打狗糖低，但在日本卻沒有市場，甚至 1890 年由於至橫濱的定期輪船也延伸到馬尼拉，日本人寧願買馬尼拉糖，也不喜歡安平糖，商人損失嚴鉅。<sup>35</sup> 進言之，由於消費偏好，使得 1880 年代中葉之後至 1900 年，打狗紅糖大概全部輸往日本，安平紅糖則主要運往中國，僅有少數白糖運往香港。<sup>36</sup>

打狗和安平糖出口市場的差異，影響兩地糖商的貿易經驗及其異族觀。打狗糖最先主要輸往日本最早開港的橫濱，之後少數運到神戶，<sup>37</sup> 糖商最初也往橫濱發展。前述順和行的陳福謙，約於 1856 年擔任美商羅賓奈洋行 (W.M. Robinet & Co.) 的買辦，此洋行倒閉之後，轉任英商德記洋行買辦。1862 年至 1863 年，於旗後 (今高雄旗津) 設立順和行；1870 年，又擴大規模，設順和棧於苓雅寮，負責採購南臺灣砂糖、銷售鴉片，且在東港、阿里港、鹽水港均設有糖棧，以預付款方式收購砂糖。<sup>38</sup> 同年，陳福謙雇用西洋帆船，由年僅 17 歲的陳中和押運砂糖直接至橫濱發賣。最初每月往返橫濱一次，<sup>39</sup> 於大德堂發兌，1876 年正式在橫濱 186 號租屋設立順和棧 (Soon Ho Chan)，專門經營砂糖業，在長崎、神戶也有分棧。1882 年 5 月，陳福謙過世，陳中和才回打狗，「總辦砂糖商順和號，配糖往橫濱」。<sup>40</sup> 由此可見，1870 年起，陳中和已經到橫濱經商，至少於 1876 年至

<sup>33</sup> 臺灣糖季一般是從每年 10 月至 5 月。但打狗的糖市場於每年 12 月時開張，1 月第一次運出港，通常大概一半的產品以輪船運行於打狗和橫濱之間，直至 3 月底。'Report on the Trade of Taiwan for 1887,'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ume 4: 1886-1893, p. 173; 'Tainan Trade Report for 1890,' in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ume 4: 1886-1893, p. 398.

<sup>34</sup> 〈本島糖業調查書〉(1897 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181001。

<sup>35</sup> 在臺灣府和打狗之間的糖產區，則依照價格高低來決定輸送去哪一個港口。因此，有時候運至打狗，有時運至臺灣府。'Report on the Trade of Taiwan for 1888,' p. 240; 'Tainan Trade Report for 1890,' pp. 396-398.

<sup>36</sup> 1900 年，安平糖因至日本無關稅，至中國則需要，而轉向輸往日本。〈糖金相繫〉，《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2 月 16 日，第 5 版；上野專一，〈臺灣視察復命書〉，第 2 號，無頁碼。

<sup>37</sup> 大藏省理財局，〈臺灣經濟事情視察復命書〉，頁 213；樋口弘，〈日本糖業史〉(東京：味燈書屋，1956)，頁 495-496。

<sup>38</sup> 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頁 17-21；楊玉姿，〈清代打狗陳福謙家族的發展〉，頁 1-19；趙祐志，〈「順和棧」在橫濱 (1864-1914)〉，頁 193-210。

<sup>39</sup> 〈臺灣の砂糖船〉，《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 月 1 日，第 37 版。

<sup>40</sup> 「陳中和履歷書」，〈黃成章以下八名敘勳ニ關スル件 (拓殖務省民政部)〉(1897 年)，《臺灣總督府



1882 年待在日本，經營橫濱順和棧。

陳福謙所奠定的事業，1887 年透過分家，大多被他的弟弟陳北學所繼承，主要在臺南經商的陳北學，因而變成具有實力的大糖商。<sup>41</sup> 另一方面，1887 年 11 月，陳中和在打狗招攬陳福謙的家族成員，以股份方式，合資創立和興公司，主要業務是經營中國、香港以及日本間的進出口貿易；同時也接受委託販賣，抽取 2% 的佣金，橫濱順和棧則變成其支店。<sup>42</sup> 1890 年，和興公司已經控制鳳山縣糖產區一半以上的糖貨，<sup>43</sup> 取代順和行，成為控制打狗糖最大的企業。除了經營和興公司之外，陳中和又代理香港安泰、萬安、濟安、普安等保險公司，擔任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乾元保險公司、英商唛記洋行（Wright & CO.）的買辦。<sup>44</sup> 之後，儘管陳中和與陳福謙家族因為和興公司或是橫濱順和棧，產生糾紛或訴訟，<sup>45</sup> 但 1887 年之後，陳中和大致以和興公司為基盤，又透過廣布日本、香港以及東南亞的事業網絡，逐漸取代陳福謙家族，變成打狗最重要的糖商。

陳中和回到打狗的翌年，1883 年，才 13 歲的王雪農，剛好進入順和行學習做生意。1885 年，僅兩年時間，就被派往橫濱順和棧擔任記帳，1890 年升任副總經理（支配人）。<sup>46</sup> 很明顯地，王雪農入行才兩年就外派到橫濱，掌管帳務，應贏得陳中和的賞識和信任，而一手栽培和重用，也因此建立此後兩人「主僕」長久而輔車相依的關係。

1895 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全臺各地武裝抗日風起雲湧，陳中和因被臺南抗

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221001。

<sup>41</sup> 陳北學最初選擇在府城發展，1870 年代已經在府城內宮後街經營布店新瑞和號，光緒 10 年（1884）為釐金包商，光緒 13 年（1887）因家族分家，而取得陳福謙大半的遺產，包括府城邦記號、打狗順源號、東港順懋號、阿里港順源棧以及旗後德記洋行買辦。李佩蓁，〈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頁 44-45。

<sup>42</sup> 張守真、楊玉姿指出，橫濱順和棧變成和興公司支店之後，改名順和興記棧（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頁 92）。但是由相關文書和碑文看來，仍稱橫濱順和棧。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神戶：該會，1909），頁 115；〈光緒三十二年重修長崎天后宮碑文〉（現藏於長崎唐人敷跡天后宮）。

<sup>43</sup> 「陳中和履歷書」；李佩蓁，〈國際貿易與臺灣糖商的轉型：以打狗陳福謙家族為例，1860-1905〉，頁 61-63；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頁 90、92。

<sup>44</sup> 「陳中和履歷書」。

<sup>45</sup> 詳見：張守真，〈「橫濱順和棧」產權轉承問題探討〉，頁 379-385；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第三章。

<sup>46</sup> 「王雪農履歷書」；中神長文編，《臺南事情》（臺南：小出書店，1900），頁 132。與王雪農履歷書比較，日治時期有關王雪農的紀錄，有不少錯誤，中神長文的記事也有些出入、錯誤，例如王雪農 1885 年至 1895 年都在橫濱，1895 年才回到臺灣。

日義軍首領劉永福捐派金錢、米穀，避往廈門，而讓王雪農回到臺灣，代他管理和興公司事務，並且幫日軍探報敵情，調度軍糧、薪炭。1895年10月19日，劉永福敗逃回中國，南臺灣的臺灣民主國潰滅，21日日軍進入臺南城，11月13日戰爭正式落幕。<sup>47</sup>翌年1月，陳中和即從廈門回到打狗，帶領王雪農等部下，繼續協助日軍調查臺人抗日情報。和興公司甚至因此一度受到抗日分子圍攻，陳中和倉皇逃走，倖免於難。<sup>48</sup>由此可見，在日本有長住和貿易經驗的王雪農和陳中和，顯然因親身見證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對於日本割讓臺灣一事，採取正面面對、甚至協助日軍而打擊臺灣武裝抗日分子的策略。

相對於打狗糖商的作法，從風聞日本割臺開始，臺灣各地大紳商不是建立臺灣民主國、參與武裝抗日，就是紛紛內渡中國。至1897年5月，日本政府給予臺灣人國籍選擇期滿，先後出現兩次的內渡潮。第一次，是1895年日軍登陸臺灣前後，第二次是國籍選擇期滿時。其中，第二次內渡潮時，臺灣各地相當平靜，甚至不少人選擇回到臺灣，<sup>49</sup>僅有臺南地區卻因鼠疫流行、對鴉片漸禁令的疑慮以及聽信有關臺灣總督府政策的種種謠傳，眾多人內渡。因此，最終選擇內渡的臺灣人共6,456人，雖然僅佔總人口的0.23%，卻以臺南縣4,500餘人最多，高達70%，而且大多是住在臺南城內外中等以上的居民。<sup>50</sup>

臺南府城地區內渡者最多，除了前述吳文星指出的原因及文化民族意識的影響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全臺「富商大賈留在臺灣者十之八九」，<sup>51</sup>為何長期以來掌控府城商業牛耳的三郊，卻「郊員四散」，直至1899年，仍是「北郊

<sup>47</sup> 鄭天凱，《攻臺圖錄：臺灣史上最大一場戰爭》（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128-137。臺灣民主國的成立和消失，參見黃昭堂著、廖為智譯，《「臺灣民主國」研究：臺灣獨立運動史的一斷章》（臺北：前衛出版社，2005）。

<sup>48</sup> 〈林振芳外二名及潘文杰外三名敘勳／儀稟申並黃成章以下十三名勳章及附屬品送付二依り傳達ノ件〉（1897年12月27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221007。

<sup>49</sup> 林玉茹，〈略論十九世紀末變局下鹿港郊商的肆應與貿易：以許志湖家貿易文書為中心的介紹〉，收於林玉茹、劉序楓編，《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1895-18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頁32-56。

<sup>50</sup> 全臺大概6,400餘人內渡，其中臺北縣1,564人，臺中縣301人，澎湖81人。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30-31；黃紹恆，〈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頁94。

<sup>51</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25、39。

停止業務，南郊僅十之二、三營業」。<sup>52</sup> 即便前述主要繼承陳福謙產業的陳北學，也於 1895 年至 1900 年回到廈門，在臺灣的產業則分別交由當事管理，直到發生糾紛才不得不返回臺灣。<sup>53</sup> 臺南府城商人的反應，正展現對外貿易地、貿易對象，充分影響商人的國際觀或異族觀。北郊、南郊主要與中國各地進行貿易，如同打狗商人一般，在中國各貿易港埠設立分棧或有委託代理行，互相透過中式帆船或輪船信局進行各種訊息傳遞，<sup>54</sup> 因此對於中日甲午戰爭、日本割臺的謠傳也比一般人接觸更快、「想像」更多。由當時《鹿港許家文書》和《尺素頻通》等僅與泉州、廈門、寧波做生意商人的往返通信即可看到，他們完全不瞭解異族日本，仍停留在「倭寇」的文化偏見和想像中，因此割臺時倉皇內渡，然而卻因在內地適應不良的窘況，在國籍選擇前才又回到臺灣。<sup>55</sup> 另一方面，如道光中葉臺灣道姚瑩所指出，臺南郊商不少是「店在此家在彼」，在福建原鄉往往置有產業、宅地，<sup>56</sup> 因此更有條件選擇返回中國定居。

臺南糖商也由於安平糖主要運往中國沿海各地貿易，大多陷入「乙未內渡恐慌」中。相對地，少數與橫濱、神戶貿易的糖商，選擇留在臺南，他們也成為之後王雪農重振三郊的主要成員。例如，住在南勢街的郭炭來，經營郊行寶源號，與神戶、橫濱的商人交易砂糖，後來成為臺南三郊組合幹事長；北勢街的砂糖商蔡菜包，經營謙盛益號，一方面經營農業，放貸給人民，且派人至橫濱和神戶進行米穀和砂糖貿易。<sup>57</sup> 正因為他們與陳中和、王雪農一樣，有日本貿易經驗，以

<sup>52</sup> 川北幸壽，《臺灣金融事情視察復命書》（臺北：臺灣銀行，1902），頁 146。

<sup>53</sup> 李佩蓁，〈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頁 45-46。

<sup>54</sup> 有關郊商訊息的傳遞和情報網的建構以及其影響，參見林玉茹，〈通訊與貿易：十九世紀末臺灣與寧波郊商的訊息傳遞〉，頁 157-193。

<sup>55</sup> 1895 年前後，鹿港郊商對於日本割臺的反應和謠傳，參見林玉茹，〈略論十九世紀末變局下鹿港郊商的肆應與貿易〉，頁 32-56；林玉茹編，《尺素頻通：晚清寧波與泉州、臺灣之間的貿易文書》（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 360。

<sup>56</sup> 姚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復堂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1960），頁 2。1833 年，*The Canton Register* 也有同樣的觀察。“Rebellion Formosa,” *The Canton Register*, May 18, 1833, 轉引自：朱瑪瓏，〈自由貿易、帝國與情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紀事報》中的臺灣知識〉，《漢學研究》（臺北）32:2（2014 年 6 月），頁 64。具體例子如，許藏春就在泉州和臺南北勢街（神農街）和海安路都有住家、店舖以及貨棧。2016 年泉州和臺南田野調查資料。

<sup>57</sup> 蔡菜包也經營煙草業。〈產業上ノ功勞者及篤志者姓名及閱歷〉（1899 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432008；中神長文編，《臺南事情》，頁 114；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臺北：該會，1905），上卷，頁 267。

致於對異族日本有比其他臺南商人更真確的認識，更能正面看待日本割臺事實。

### 三、趁亂之隙：由打狗入主臺南

透過跨國貿易經驗，商人所形塑的國際觀，不僅影響其在日本割臺時的去留選擇，而且展現在他們主雇經營倫理的建立及事業空間布局上。本節首先分析王雪農為何進入臺南發展事業；其次，說明 1905 年以前以德昌公司為中心的事業及其發展。

#### (一) 劃分地盤：東家與雇員的事業空間布局

陳中和和王雪農都有長期在橫濱貿易的經驗，王雪農更是「自少游東洋，旅居十餘載」，而且時常往來神戶、大阪。<sup>58</sup> 與那些總是固守於唐人街，不融入異國當地的傳統華人不同，他們兩人均能講日語，陳中和早於 1873 年與安部幸兵衛建立貿易關係，<sup>59</sup> 「通曉日本的事情」，王雪農也「與內地（日本）商人往來無間」，甚至較其他商人還要親密。<sup>60</sup> 正由於他們長居日本，又與日商關係相當密切，對於日本企業文化和經營倫理多少有所認識；加以，橫濱和他們常走訪的大阪是明治維新時期的商業重鎮，<sup>61</sup> 日本如何走向商業現代化，應該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可以說是晚清最瞭解日本的臺灣人。

另一方面，如同前述，陳中和自述一開始是在大德堂發售砂糖。大德堂其實是來自廣州、肇慶商人組成的廣肇幫所經營。<sup>62</sup> 廣肇幫在橫濱華僑中佔居壓倒性

<sup>58</sup> 〈會計得人〉，《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11 月 20 日，漢文報第 6 版。

<sup>59</sup> 陳中和 1873 年將打狗糖運到橫濱，賣給榎並屋的安部幸兵衛（1847-1919）。1884 年安部在橫濱開增田屋安部幸兵衛商店。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頁 80-81。

<sup>60</sup> 〈林振芳外二名及潘文杰外三名敘勳ノ儀稟申並黃成章以下十三名勳章及附屬品送付ニ依リ傳達ノ件〉；〈會計得人〉，《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11 月 20 日，漢文報第 6 版。

<sup>61</sup> 橫濱是日本第一個開港地，最先吸收最多的西方文化和新知。大阪則在五代友厚帶領之下，不僅持續維持商業中心地位，也是關西商業西化重鎮。津川正幸，〈五代友厚と堂島米商会所：明治 13 年 3 月，4 月限賣中止一件〉，《關西大學經濟論集》（吹田）22: 1（1972 年 5 月），頁 1。

<sup>62</sup> 大德堂是由廣州、肇慶兩府成立的廣肇幫商人所經營，主要進行香港砂糖輸入橫濱貿易，經營商品尚有米谷、樟腦、茯苓、大黃。趙祐志，〈「順和棧」在橫濱（1864-1914）〉，頁 196、206-207。

的多數，也控制了 1870 年左右成立的中華會館。<sup>63</sup> 由陳中和於 1876 年被選為中華會館董事可見，<sup>64</sup> 他與廣肇幫商人關係匪淺。這應該也為他進一步建構了往香港貿易的網絡。由於臺灣與日本的砂糖貿易，除了派店員長期駐守橫濱、神戶之外，有時需要經過香港，或是從橫濱正金銀行匯寄貨款到香港香上銀行（匯豐銀行前身），再購買石油、鴉片以及雜貨回臺；<sup>65</sup> 加以 1885 年之後，臺灣紅糖在橫濱市場遭遇來自香港洋人機械化製糖的激烈競爭，<sup>66</sup> 因此外派的貿易商往往也需至香港現地採購貨品、偵察商況，而有深厚的香港經驗，並藉機學習國際貿易經營手腕。<sup>67</sup> 陳中和就因為曾在廈門、香港往來，能說英語，而「熟知亞洲大勢」。<sup>68</sup> 他一手主導的和興公司，沒有採用臺灣傳統行號命名，<sup>69</sup> 合資股東剛好 7 人，且以家族資本為基礎組成私人公司或封閉式公司（closed company），應即是學習外商公司所致，<sup>70</sup> 以便經營國際貿易。這是由於 1862 年英國制訂「公司法」，1865 年引入香港，規定組成公司的股東最少 7 人，也使得此後使用「公司」命名的新企業更為普遍。<sup>71</sup> 1890 年代，陳中和、王雪農及外商合夥成立的事業，大多稱作

<sup>63</sup> 伊藤泉美，〈橫濱華僑社會の形成〉，頁 16-21；趙祐志，〈「順和棧」在橫濱（1864-1914）〉，頁 203-205。

<sup>64</sup> 「陳中和履歷書」。

<sup>65</sup> 〈南部商業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8 日，第 4 版；〈南部商業談（承前）〉，《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9 日，第 4 版；宮崎健三編輯，〈陳中和翁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1），頁 10。

<sup>66</sup> 高淑媛，〈洋人生產機械化與臺灣糖業：以橫濱的打狗糖為例（1870-1895 年）〉，頁 7-25。

<sup>67</sup> 〈南部商業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8 日，第 4 版；〈南部商業談（承前）〉，《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9 日，第 4 版。

<sup>68</sup> 〈林振芳外二名及潘文杰外三名敘勳ノ儀稟申並黃成章以下十三名勳章及附屬品送付ニ依リ傳達ノ件〉。

<sup>69</sup> 「公司」一詞雖然早已經出現。詳見：劉序楓，〈近代華南傳統社會中「公司」形態再考：由海上貿易到地方社會〉，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227-266。但在和興公司之前，臺灣並沒有以公司命名的商號。以竹塹和鹿港地區而言，直至 1895 年都是以行號為名。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聯經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附表 2。

<sup>70</sup> 張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頁 103。

<sup>71</sup> 英國於 1855 年制定《有限責任法》（Limited Liability Act, 1855），1862 年修正後，正式將該部法律稱之為《公司法》。1865 年香港依據英國 1862 年的《公司法》制定首部《公司條例》。香港公司註冊處，〈香港公司註冊的歷史：研究報告〉（香港：該處，2013），頁 12；李宗鐸，〈香港合約法和公司法〉（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頁 100-104。

公司而少用行號，<sup>72</sup> 王雪農成立的德昌公司甚至也稱作「德昌洋行」。<sup>73</sup> 進言之，儘管如李佩蓁所說，和興公司體制仍有其侷限，但僅視作「傳統中國合股的成熟形式」，仍低估其變化。《臺灣私法》指出，晚清臺灣傳統合股已經出現第一次變遷，具有「精密而合理」的契約，王泰升則稱作「變型的傳統合股」，<sup>74</sup> 應更為妥切。和興公司雖然還未完全變成西方式企業，然而仍不能忽視 1880 年代以和興公司為濫觴，臺灣商業開始出現以「公司」命名及更細緻的合股契約的歷史意義。陳中和、王雪農透過長居外國貿易，擁有深厚的日本、香港經驗，甚至早在晚清時期已經拓展商業網絡至東南亞，可以說是晚清臺灣第一代親自從事跨國貿易的商人。他們擁有豐富的「商戰」閱歷，瞭解十九世紀末國際的新變局，並最先追隨「公司」時潮，以便經營跨國貿易。

也因此，陳中和沒有完全採取以家族血緣為主的經營管理模式，而是任人惟才。王雪農顯然因精於會計，而受到他的重用，甚至避居廈門時，代為管理商務（管事），為其左右手。陳中和與王雪農主、雇之間輔車相將的關係，應仿若陳福謙與陳中和模式的複製。不過，或許基於親身經驗，以及目睹陳福謙、陳北學家族之間的爭產、纏訟，<sup>75</sup> 給予陳、王兩人前車之鑑，而讓他們由主雇關係朝向各自確立事業地盤、攜手合作的經營布局。

日本傳統的商業倫理，或許提供他們借鏡。舉例而言，越後屋是三井財團前身，即將雇用的職員按年齡和工作能力分成多種階層，長期任職的職員由住宿傭工晉升到從自己家裡通勤的「別家」之後，頭家可以讓其獨立成家，並使用商店的商標，共享商業信用。京都和大阪的商家大多有讓沒有血緣關係、長期任職的掌櫃（番頭）獨立門戶的習慣，以作為獎勵。<sup>76</sup> 從廈門回到打狗的陳中和，為了

---

<sup>72</sup> 例如 1898 年他們與英商合資成立的海興公司，1903 年成立的碾米廠南興公司。王雪農的德昌號，也是以「德昌公司」之名成立。詳見以下討論。

<sup>73</sup> 明治 32 年（1899），王雪農以「德昌洋行」名義參與蔡國琳等發起的天壇重修捐款。〈重修天壇碑記〉（現藏於天公壇內）。

<sup>74</sup> 李佩蓁，〈國際貿易與臺灣糖商的轉型：以打狗陳福謙家族為例，1860-1905〉，頁 62；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東京：東洋印刷株式會社，1911），第 3 卷下，頁 120；王泰升，〈臺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290-291。

<sup>75</sup> 詳見：李佩蓁，〈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一文。

<sup>76</sup> 三井文庫編，《史料が語る三井のあゆみ：越後屋から三井財閥》（東京：三井文庫，2015），頁 39。

獎賞戰亂之際護主家有功的王雪農，也面臨這樣的課題。讓已經 26 歲、精明能幹的王雪農往臺南獨立門戶，顯然是最好的選擇。

首先，晚清打狗和臺南糖業的生產和貿易模式大不相同。從陳福謙開始，為了掌控商品砂糖，而貸款給打狗糖產區的蔗農，造成蔗農因不斷向資本家借貸，生活貧困。打狗糖也逐漸落到順和行及之後的和興公司等一、兩位貿易商手中。相對地，臺南產區的蔗農較為獨立，可以自由競爭，生活也較為富裕。砂糖貿易則由於從清初以來糖郊就與華中以北建立貿易網絡，而控制在他們手中，連外國商人都很難與其競爭。<sup>77</sup>

1890 年代，打狗糖產區既然主要由和興公司所控制，鑑於「一山不容二虎」，要獨立門戶的王雪農自然不會選擇在打狗與陳中和分庭抗禮。因此，這也是為何，陳中和年初才由廈門回到打狗，1896 年 12 月王雪農就往大西門外下南河街（今和平街）「新創德昌號」，<sup>78</sup> 從此以臺南為基地展開自己的事業。儘管王雪農仍與陳中和有密切往來，<sup>79</sup> 也有不少合夥投資關係，但兩人事業空間區隔清楚，王雪農的事業幾乎很少涉入打狗地區。由主雇聯手合作瓜分南臺灣糖業貿易，進而鼎足而立締造出明治年間「打狗陳中和、臺南王雪農」南臺灣兩大豪商的新局面，在臺灣商業史上應該是首創。由此可見，這群晚清第一批具有國際貿易閱歷的臺灣商人，如何吸取異國新知，掌握契機，擘劃商業版圖。

## （二）由糖商到實業家：臺南事業的展開

1896 年年底來到臺南的王雪農，如何展開新事業，雖然資料零散，但是仍可以透過報紙、人物誌以及各種調查交叉比對，窺豹一斑。他最先於 1896 年 12 月邀集臺灣和中國等 15 位「股東」，<sup>80</sup> 以 30 股共 3 萬元，合資在臺南府開張「中、

<sup>77</sup> 除了和興公司之外，另一位重要糖商應是張仰清家族。買威令著、林滿紅譯，〈清末南部臺灣的蔗糖業〉，頁 137、141-142；林玉茹，〈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頁 22-28。

<sup>78</sup> 「王雪農履歷書」。

<sup>79</sup> 例如 1899 年，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南下巡視，陳中和因丁憂無法謁見總督，而由當事王雪農代為接待。〈門第增光〉，《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30 日，第 5 版。

<sup>80</sup> 15 位股東是陳貞瀛、黃肇記、陳峰滄、周立記、陳啟亨、陳詳記、王成記、陳瑞記、陳禮記、葉禎記、陳隆記、孫雲記、陳捷安、周怡然以及何修記。這些股東中，黃肇記來自中國，陳隆記也投資捷興公司，極可能大多來自苓雅寮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臺北：該會，1911），第 3 卷下第 4 編，頁 7、27；臨時臺灣舊慣

外、南、北生理」的德昌公司（或稱德昌行、德昌號、德昌洋行），並於橫濱設棧，經營日本、香港、廈門、汕頭、上海、寧波、天津以及煙臺等地自行採兌配寄貨物、布匹，也專做臺南府南北九八行客貨採兌生理。<sup>81</sup>

德昌公司以出口砂糖、米穀、鹽而進口棉布、雜貨貿易為主，之後也涉足煙草製造業、龍眼及樟腦業。<sup>82</sup> 其中，尤以砂糖和米穀貿易最重要。在砂糖貿易方面，王雪農主要透過向日本七十四銀行和三十四銀行貸款，以便預先付款給製糖者收購砂糖，確保取得商品，再運往日本橫濱、神戶販售。與香港、廈門的貿易，則透過香港上海銀行交易。<sup>83</sup> 往日本的長程貿易，大多以日本或外國輪船運至橫濱交德昌棧或順和棧販賣，之後又設立神戶德昌棧。<sup>84</sup> 1900年起，也透過長崎泰鋁號、泰益號代兌糖、米，進一步將貿易網絡擴張到長崎。<sup>85</sup> 砂糖的收購範圍，原來以臺南地區為中心，最遲1903年臺灣北部砂糖也大多交由德昌公司以 OSL 代號經銷到日本，日本糖商難以與之競爭。直至1905年陳中和和王雪農糖業危機事件爆發，德昌由「糖界抽身」，北部糖才全部落入日本糖商手中。<sup>86</sup>

米穀貿易是砂糖之外，德昌公司的次要事業，不僅運米到日本橫濱、神戶、門司以及長崎販賣，而且由於1890年代以來，臺北地區米穀供不應求，往往從鹿港或南部輸入，鹿港甚至出現淡水郊。<sup>87</sup> 因此，王雪農常雇用輪船或帆船將米

---

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3卷下，頁250。

<sup>81</sup> 傳統臺灣進出口貿易商人分成九八行和船頭行兩種，九八行是幫忙客商或來港船隻蒐購土貨、銷售委賣的商品，再收取2%佣金，船頭行就是自有船隻，經營航運業。

<sup>82</sup> 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該社，1907），頁56、125、539；〈日本船の不信用〉，《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8月30日，第3版；〈本島商賈ノ資本業體及取引銀行調臺灣銀行へ送付〉（1899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600020；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頁284、369。

<sup>83</sup> 川北幸壽，《臺灣金融事情視察復命書》，頁139；〈本島商賈ノ資本業體及取引銀行調臺灣銀行へ送付〉（1899年）；〈糖金相繫〉，《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2月16日，第5版。

<sup>84</sup> 神戶的德昌棧，很可能1899年已經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頁115-118。

<sup>85</sup> 1900年3月至1910年2月，德昌號與長崎泰鋁號、泰益號通信，共10封，但主要集中在1900年至1903年、1910年等年度，其委託泰鋁號託兌糖、米，給予仲金和押匯費用。1904年之後，沒有往來紀錄，1907-1909年僅有王雪農的兒子王國賓給泰益號的賀年信箋。直至1910年才再交易。《長崎泰益號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典藏號：10931-10940。

<sup>86</sup> 臨時臺灣糖務局編，《糖業記事（第2次）》（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3），頁101；〈北部的新糖〉，《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1月15日，第2版。

<sup>87</sup> 林玉茹，〈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臺北）18:2（2007年6月），頁71-72。



運到淡水、基隆販賣。1902年1月，由於臺南第二期米失收，德昌號即以備重一千石的舞鶴丸，進口價格低廉的安南米；1903年2月，因日本前一年米秋季減收，而從臺南運載糙米到橫濱、神戶販售，<sup>88</sup> 充分展現米商配合國際市場脈動、動瞻契機的經營手腕。

除了從事砂糖、米穀「自配寄外埠」等國內外貿易之外，德昌公司也專營「南北九八行生理」，而具有九八行和船頭行性質。1898年，根據報紙報導，德昌行「兼營南北郊，包攬輪船，所配運之貨，悉數難窮，然以糖、米、杉木為大宗」。<sup>89</sup> 再從現存1902年至1904年德昌號給府城佛頭港街黃光煖經營的糖行福昌的「代兌清單」，即可一窺其貿易模式。他透過釜山丸、臺東丸以及利里亞等輪船，將福昌行的府青（TC、HGC）、臺青（KG）及北部（OSL）的砂糖，運至橫濱順和棧或德昌棧，以及神戶德昌棧，發兌給當地的日商，再向福昌行收取佣金（行仲、九八仲）、會厘（會抽、三郊會費用）、棧租、船隻運費（載資）、搬運費（駁力並碼頭費）、保險費（保安、火險）以及營業稅等費用。<sup>90</sup> 這是典型的九八行貿易，因此像陳中和一般，王雪農也為外商代辦海上保險業。<sup>91</sup>

臺灣傳統進出口貿易商，資本少者往往僅經營九八行，資本雄厚者則進一步自有船隻，直接運送商品出口，經營船頭行，<sup>92</sup> 亦即從事航運業。1898年2月，德昌行變成擁有船隻運輸的船頭行。王雪農大概先以苓雅寮庄王全新造的中式帆船金德順號來運輸，直至1906年才向王全購買，成為船主。1900年，又以602圓購買在清國石洋製造，比金德順更大的舊帆船金榮隆，改名為海隆號。<sup>93</sup> 換言

<sup>88</sup> 《長崎泰益號文書》，典藏號：10933；〈南部の安南米輸入〉，《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月1日，第2版。

<sup>89</sup> 〈會計得人〉，《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1月20日，漢文報第6版。

<sup>90</sup> 棧費指貨物存放在倉庫的費用。另外還有「自安堂」費用，仍不詳。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頁115-118。

<sup>91</sup> 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頁539。

<sup>92</sup> 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頁115-121。

<sup>93</sup> 金德順，在苓雅寮製造，船籍在安平港，三帆，長50.7尺（約15.21公尺），船寬16尺，深6.5尺，共186石（約13,392公斤），造價2,500圓。由住在臺南藥王廟街的王雪農代為申請船籍證書，由此可以看到船主與王雪農的合作關係。海隆號，在清國製造，載重309.57石。三帆，船寬10.5尺，深8.4尺，長58尺。〈支那形船金豫泰、金豐成、金怡安、金捷順、金振興、金德順、金春和船籍證書下付〉（1898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590011；〈支那形船金德順號國籍證書交付ノ件〉（1900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618026；〈支那形船金德順號國籍證書交付ノ件〉（1906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921010。

之，或許基於新造中式帆船價值不斐，精打細算的王雪農，傾向先以合作方式雇用新船，並收購臺灣本地或清國製造的中古帆船從事航運業。

金德順和海隆號兩艘帆船，主要在打狗、安平以及東港之間往來搬運貨物。然而，由於「海上風濤多險」，帆船「誠難把握，每有怡〔貽〕誤」，有志經營航運業的王雪農，1898年8月又購買兩艘兩、三百噸的小輪船，分別命名為臺灣府號和鳳山號，「獨攬利權」，經營貨物和客運運輸業。有別於中式帆船，小輪船不僅航行於南臺灣沿岸，也直接至香港貿易。<sup>94</sup> 王雪農先後透過自置帆船和輪船，將航海貨運業擴張到客運業，航線也由南臺灣沿岸擴張至香港。

然而，1904年12月，王雪農卻將臺灣府號賣給搬至大稻埕大有街的辜顯榮；翌年2月則將海隆號以600圓賣給臺南市蕃薯港街的施鹽。<sup>95</sup> 1905年6月，王雪農又委託大稻埕商人莊玉波擔任代理，將鳳山號的船籍由安平港移轉至淡水港，<sup>96</sup> 顯現其將航運業轉向臺北發展的企圖。這個現象，有可能因為一方面他藉由販賣船隻來籌集資金，趁日俄戰爭之際大量收購砂糖；另一方面，他已經透過日本網絡得知大阪商船會社即將進入安平和打狗發展，而預先布局。7月，大阪商船會社至打狗開業，收購後藤運送店之後，陳中和的和興公司、王雪農德昌公司以及陳福謙家族順源號的帆船航運業受到很大衝擊。<sup>97</sup> 很明顯地，如同砂糖、米貿易一般，王雪農有志經營的南臺灣航運業，也在1905年以後因為日本大資本家勢力的進入，而逐漸風雲變色。

除了德昌公司之外，1898年起，王雪農仍透過陳中和的提攜或合作，陸續合

<sup>94</sup> 1899年，王雪農向臺灣總督府登記兩艘輪船的船籍，取得船籍證書第13號和17號。1902年，臺灣府號輪船由安平到香港，回程因天候關係，無法在有效期限內回航，因此申請延至8月31日。〈汽船檢查證書發出數〉，《臺灣總督府府報》890（1901年1月19日），頁22；〈迴航延期認可證書交付〉，《臺灣總督府府報》1203（1902年8月14日），頁30；〈沿岸開航〉，《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8月6日，第3版；〈輪運頓興〉，《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8月14日，漢文報第5版；〈瀛船信號〉，《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1月11日，第3版。

<sup>95</sup> 這艘船經4年後營運後，幾乎以同樣價格賣出。〈汽船臺灣府號船舶國籍證書下付ノ件〉（190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828016；〈施鹽出願支那形船怡隆號國籍證書下付ノ件〉（1905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860039。

<sup>96</sup> 鳳山號，甲板一層，二帆，有網具，由香港同昇廠林書居製造，1897年5月下水，6月製造汽罐。總噸數72，登簿噸數38，16馬力，造價11,000圓，船長黃珪記。〈汽船鳳山號國籍證書書換下付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861005。

<sup>97</sup> 〈商船會社開運送業〉，《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7月18日，漢文報第3版。

資組成海興公司、參與鹽務、發起成立信用組合、設立新式機械碾米業南興公司以及投資臺灣銀行。其中，僅有信用組合一案沒有成功，王雪農另外與陳福謙的兒子陳文遠合作，創立合名會社臺灣農商銀行。

1898年，陳中和、王雪農以及 Robert Hastings 三人合資，於安平成立資本額 7 萬圓的海興公司（South Formosa Trading Co. L'd.），<sup>98</sup> 該公司以 Hastings 作為總經理（支配人），專門經營外國貿易，收購糖、米範圍以鹽水港和嘉義地方為中心。砂糖貿易原先以出口至天津居多，1899 年之後因關稅改變，與日本交易逐漸增加。陳中和和王雪農由於經辦對歐美各國貿易事務，交易銀行是國際銀行（National Bank），海興公司也是該銀行的代理店；1899 年也交由三十四銀行支店來經手。<sup>99</sup> 像一般砂糖貿易商一般，海興公司以貸款給生產者，來確保砂糖和米穀來源。1904 年，該公司以經營製糖機械、各種貨物的進出口、運輸業以及精米業為目的，已經變成由日本（臺灣）、英國以及中國等三國人共同設立的株式會社。<sup>100</sup> 直至 1906 年，仍看到該公司借款給糖廊主，以及委託邱珣代向嘉義和鹽水港地區未履行預付契約的債務人，催繳應交付的糖、米。<sup>101</sup>

臺灣鹽業在清代時期由政府專賣。日本領臺之初，透過調查，臺灣總督府決定廢除官鹽，讓鹽歸自由買賣。但之後弊端叢生，1899 年 3 月鹽再度歸政府專賣，各地設立鹽務局，下轄鹽務總館、支館來營運。<sup>102</sup> 1899 年 6 月，殖民政府選定各地重要的紳商擔任主任、承辦總代以及支配。臺灣南部地區，從臺南、鳳山、恆春至後山的臺東，都是由陳中和擔任承辦，各地再設支配。相對於各地紳

<sup>98</sup> 1904 年臨時舊慣調查會指出，海興公司是 1849 年在香港開業的 The South Formosa Trading Company L'd. 的支店，1899 年在安平、臺南以及鳳山設置店鋪。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 3 卷下，頁 250-251。

<sup>99</sup> 川北幸壽，《臺灣金融事情視察復命書》，頁 138-139；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 3 卷下第 3 編，頁 142-143。

<sup>100</sup> 新增的中國股東，無資料可知其身份。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 3 卷下，頁 251。

<sup>101</sup> 1905 年 10 月，鹽水港察仔廊陳賽以糖廊向安平海興公司借銀四百五十元。先前與王國相（王雪農之子）的契約作廢。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 3 卷下第 3 編，頁 2-3、141-143。

<sup>102</sup> 1901 年，臺灣總督府設立專賣局，統合所有專賣事業，廢止鹽務局。日治初期鹽業發展及制度演變，參見張麗芬，〈食用到工業用：日治時期臺灣鹽業發展之變遷〉（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頁 57-66。

商僅負責個別區域的鹽務，陳中和卻是全臺灣控制鹽務地域最大、最多的人。由此可見，和興公司在南臺灣的勢力及其範圍。臺南的支配則由王雪農擔任。<sup>103</sup> 換言之，透過陳中和網絡，王雪農得以參與日治初期籠絡地方重要紳商的鹽務。

除了傳統的商業之外，陳中和和王雪農也嘗試參與新式事業。由於從晚清以來，南臺灣往日本的跨國貿易，需要透過銀行來交易或融資，以便貸款給製糖業者，因此如前所述，他們很早即與銀行有交易的經驗，甚至擔任外商銀行的代理。相對地，根據 1899 年 5 月的調查，臺灣商人僅有 25 間、6.4% 與銀行有往來。<sup>104</sup> 其中，基隆 3 間、臺南縣 22 間，主要是臺南西門外的砂糖、雜貨郊行，<sup>105</sup> 應即與他們採取預付制的經營模式有關。正由於對資金的需求及瞭解銀行的重要性，也讓臺南和打狗商人最先隨著日本政府發布銀行條例可適用於臺灣，而主動發起成立信用組合或銀行。

1898 年 9 月，日本帝國政府公布在臺灣實施 1890 年頒布的銀行相關條例，使得臺灣有設立銀行的法源依據，<sup>106</sup> 官營臺灣銀行得以正式成立。然而，最初卻因主要貸款給政府及資金不足，使其對於產業、貿易資金的融通有所侷限；另一方面，則因為臺灣人大多不瞭解銀行，且臺灣銀行與地方關係不深，導致不易發展庶民金融業務。<sup>107</sup>

1899 年 12 月，由荒井泰治等在臺日資代表，遂首先根據銀行條例，合資成立資本額 15 萬圓的臺灣第一間民營銀行臺灣貯蓄銀行。<sup>108</sup> 翌年，臺灣銀行為了使其資金力量可以滲透到地方，避免新設銀行帶來同業競爭，而勸誘臺灣各地重

<sup>103</sup> 〈鹽務總館役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6 月 30 日，第 2 版；〈鹽務總館役員〉，《臺灣總督府府報》549（1899 年 6 月 30 日），頁 55。

<sup>104</sup> 李為楨，〈日治初期臺灣地方金融組織法制化之前奏（1900-1912）：以信用組合為中心〉，《臺灣史學雜誌》（臺北）18（2015 年 6 月），頁 8-9。

<sup>105</sup> 臺南縣實際上有 25 間（上面李為楨的統計，扣除中國人所屬的 3 間商號）與銀行有交易關係的商店，除了兩間位於安平、三間是中國人所有之外，主要位於南勢街，北勢街，頂南河街，佛頭港街，內、外宮後街，看西街以及竹仔街，其中大多是經營砂糖、雜貨貿易的郊行。〈本島商賈ノ資本業體及取引銀行調臺灣銀行へ送付〉（1899 年）。

<sup>106</sup> 詳見：李為楨，〈日治初期臺灣地方金融組織法制化之前奏（1900-1912）：以信用組合為中心〉，頁 7。

<sup>107</sup> 黃紹恆，《臺灣經濟史中的臺灣總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134；李為楨，〈日治初期臺灣地方金融組織法制化之前奏（1900-1912）〉，頁 10-11。

<sup>108</sup> 張怡敏，〈臺灣貯蓄銀行之設立及其發展（1899-1912 年）：兼論臺灣史上首宗銀行合併案〉，《臺灣史研究》23: 1（2016 年 3 月），頁 41-42。

要資產家設立信用組合。<sup>109</sup>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中和、王雪農、吳子周、蔡國琳、許廷光、黃修甫、吳磐石以及郭炭來等「南部本島人中有力量者」，發起設立資本金 40 萬圓的臺南信用組合，由組合員出資，並藉助臺灣銀行和三十四銀行的融通，提供資金給組合員，「以圖企業的發達」。不過，由於發起人意見不一致，以王雪農、陳文遠為首主張應設立銀行，<sup>110</sup> 以臺南重要紳商為中心所提出的臺南信用組合案，最後胎死腹中。

王雪農對於參與銀行事業則情有獨鍾。一方面，他於 1900 年與陳中和投資臺灣銀行，成為該行中少數的臺灣人股東。<sup>111</sup> 另一方面，仍繼續和陳文遠等主張根據銀行條例設立銀行一派，從 1900 年起一再集會，至 1902 年 11 月，以王雪農為發起人，向臺灣總督府提出申請書，甚至趁總督兒玉源太郎南巡之際，直接陳述設立銀行的意願。然而，最初輿論界對於王雪農等要設立銀行顯然採取批判的立場，總督也認為「時機尚早」，王雪農仍以三郊會長身分援引銀行條例，召集有志者，決定共同設立 10 萬圓的農商銀行。在他們戮力爭取之下，並按照總督府建議不斷修改細節，至 1903 年 8 月風向逐漸改變。儘管大藏省基於日本本土設立的小銀行弊端不斷，而規定不准新設資本 50 萬圓以下的小銀行，但是輿論已經指出「對本島有特別事情，自不能與內地做一概觀。大約諒當得許可也」。<sup>112</sup> 9 月，兒玉總督與大藏省直接協商，決定准許農商銀行設立。10 月，陳文遠以「代表者、頭取（董事長）」名義，正式向大藏省提出登記合名會社臺灣農商銀行。在登記書中，載明本店設在臺南頂南河街（今和平街），營業目的是提供農商業者金融疏通的銀行業。出資股東有住在打狗苓雅寮的陳文遠 4 萬圓，以及臺南打銀街（今民權路）的葉爾純 3 萬圓，王雪農 2.5 萬圓以及下橫街（今仁愛街）的平野

<sup>109</sup> 波形昭一，《日本植民地金融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5），頁 269；李為楨，〈日治初期臺灣地方金融組織法制化之前奏（1900-1912）：以信用組合為中心〉，頁 3-38。

<sup>110</sup> 川北幸壽，《臺灣金融事情視察復命書》，頁 147。

<sup>111</sup> 1899 年 12 月臺灣銀行初成立時，臺灣人股東僅有辜顯榮、郭春秧、宜蘭地區李望洋等 4 人，1900 年陳中和和王雪農新加入。王雪農持股 65 股，直至 1903 年仍是臺灣人股東中持股第三多者。張怡敏，〈臺灣銀行股東構成之特徵與其意義（1899-1919）〉，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輯，《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7），頁 494-495；〈本島人銀行股主〉，《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9 月 8 日，第 3 版。

<sup>112</sup> 〈臺南信用組合の設備〉，《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2 月 12 日，第 2 版；〈本島人計畫の銀行〉，《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1 月 13 日，第 2 版；〈倡設銀行〉，《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8 月 15 日，第 3 版；〈臺灣農商銀行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9 月 1 日，第 2 版。

六郎 5,000 圓。<sup>113</sup> 其中，平野六郎其實僅是暫時出名，銀行設立之後，其股份將由原發起人臺灣銀行打狗出張所所長中國震之助承接。王雪農最初出任理事，但 1905 年已是農商銀行社長，總經理則是中國震之助，農商銀行也變成「本島人出資」的株式會社，並在嘉義設置出張所。<sup>114</sup> 很明顯的，臺灣農商銀行是由臺灣人發起，第一間以臺灣人資本為中心、且是唯一在臺南開設的民營銀行。從其成立到營運，王雪農是最重要的運籌帷幄者，以新頒布的銀行條例為籌碼，即使在輿論、總督以及大藏省反對之下，仍不斷磋商，最後終於成功，可以說是第一位創立現代銀行的臺灣企業家。

朝向機械碾米業發展，是陳中和和王雪農合作的首樁新式事業。1901 年 5 月，鑑於出口米市場看好，<sup>115</sup> 他們與安平의 英商 Charlie Hastings (夏里迷士真虞) 合資，在當地設立新式機械碾米會社南興公司，在打狗也設置碾米廠。南興公司購置 40 馬力的機械，每天可以碾出米 200 石；1903 年 8 月，Hastings 卻因利益糾紛而退股，遂變成「純本島人事業」。<sup>116</sup> 南興公司是臺灣第一間改變傳統土壟間碾米法的新式電動碾米廠，<sup>117</sup> 陳中和和王雪農也是臺灣最早使用動力機械進行碾米的實業家。

除了與陳中和一起合作或參與的傳統和新式事業之外，王雪農也積極地在臺南地區發展新式製糖事業以及入境隨俗地經營魚塢。1898 年 3 月，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之後，日本對臺灣統治才穩定，並逐漸展開「殖產興業」，振興臺灣糖業。1900 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正式成立，在創始股東之中，卻僅有陳中和 (750 股) 和王雪農 (250 股) 兩位臺灣人。1901 年 3 月，殖民政府透過揚文會向臺灣仕紳募集資本，但是反應冷淡，兒玉總督只好直接到東

<sup>113</sup> 〈合名會社臺灣農商銀行登記事項届出ノ件、臺南廳〉(1903 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904005；〈農商銀行〉，《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9 月 2 日，第 3 版。

<sup>114</sup> 「王雪農履歷書」；〈臺南農商銀行近況〉，《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9 月 27 日，第 4 版。

<sup>115</sup> 1898 年日本因為米穀欠收，第一次從臺灣進口米。1899 年米價也暴漲。〈南部の十年 米糖の價格〉，《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1 日，第 22 版。

<sup>116</sup> 〈臺南精米所の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5 月 30 日，第 2 版；〈安平精米所の景況〉，《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8 月 27 日，第 2 版；〈安平精米所景況〉，《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8 月 28 日，第 3 版。

<sup>117</sup> 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從糖業貿易到財經世界》，頁 111；李力庸，《米穀流通與臺灣社會 (1895-1945)》(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頁 51。

京遊說財界有力人士。9月，新渡戶稻造提出有名的〈糖業改良意見書〉之後，翌年6月臺灣總督府發布「臺灣糖業獎勵規則」，積極推動新式製糖業。<sup>118</sup>

在糖業獎勵政策之下，原來對於新式製糖業抱持懷疑態度的臺灣人資本家開始改變態度。1902年9月，以盧經堂（安平 Bain 洋行原買辦）為首及7位股東，基於糖業獎勵政策，首先設立資本額20萬圓的維新製糖合股會社。<sup>119</sup>此後，各地紛紛出現製糖會社。自1903年4月起，王雪農即陸續參與或投資多家製糖會社，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擔任社長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和臺南製糖株式會社。為了確保商品砂糖的取得，投資或是創設製糖會社應是王雪農在德昌公司之外，最積極投入且重要的事業。由於日治時期臺灣製糖業的發展研究成果眾多，此處不贅，僅大概說明其成立過程，顯現王雪農的角色及其事業版圖的擴張。

1903年12月12日，王雪農與鹽水港廳的翁煌南、葉瑞西、黃錦興、郭升如、周及三以及查畝營庄（臺南市柳營區）劉神嶽等人發起，設立資本額30萬圓6,000股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以購置350噸能力的機器來製造粗糖和販賣為目的，本社及工場在鹽水港廳岸內庄（臺南市鹽水區）。為了申請糖業獎勵金，王雪農提出包括股東募集、作業時間、原料取得、機器購買、收支預算以及地圖等詳細的章程和計畫書。臨時臺灣糖務局最後通過給予糖業獎勵金高達223,849圓。<sup>120</sup>1904年3月，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在鹽水港召開創立總會，選舉王雪農為社長，董、監事如附表一。<sup>121</sup>由上可見，儘管75%創社資本需要透過總督府補助，鹽水港製糖會社是王雪農根據糖業獎勵政策，與嘉義義竹、鹽水、柳營及麻豆地區的糖商、地主以及仕紳共同出資成立、對外公開募資的株式會社。王雪農的糖業網絡更進一步往鹽水、嘉義地區擴張。

<sup>118</sup> 黃紹恆，〈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頁99、105；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頁113-114。

<sup>119</sup> 維新製糖屬於改良糖廠，後來因為股東出資問題，於1904年5月事業中止。盧經堂是臺南三郊成員，也是豐源號行主。〈臺南通信 維新製糖會社計畫の成行〉，《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9月7日，第3版；〈臺南通信 維新製糖會社の開社式〉，《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9月16日，第2版；〈製糖會社之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5月17日，第3版；黃懷賢，〈臺灣傳統商業團體臺南三郊的轉變（1760-1940）〉，頁61，表3-1。

<sup>120</sup> 股東於明治36年12月27日為限募集。〈糖業獎勵金下付二關シ臨時臺灣糖務局へ指令（指令第九六八號）〉（190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817001。

<sup>121</sup> 〈臺南通信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3月27日，第2版；〈臺南通信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3月30日，第4版。

在成立鹽水港製糖會社的同時，王雪農整合了原先由臺南市街、大目降（臺南市新化區）以及灣裡街（善化區）的紳商，企圖創立的4個製糖會社，而於1904年5月成立資本額30萬圓的臺南製糖株式會社，社址在臺南城大東門外崁腳庄（臺南市仁德區），主工場在灣裡街東勢庄（善化區），分工場有三處。社長是王雪農，董、監事如附表一。<sup>122</sup> 臺南製糖會社顯然是集結了包括府城、新化、善化、玉井以及關廟等臺南縣內重要的製糖業者而成立，突顯了王雪農已經跨出臺南市，確立了其在大臺南地區製糖業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次，他所成立的兩家製糖株式會社，也打破了過去研究認為日治初期臺灣人不能設立株式會社的刻板印象。

為了搬運製糖原料及會社用品，王雪農也以臺南製糖會社和鹽水港製糖會社社長身份，先後於1905年2月和5月，向臺灣總督府申請敷設灣裡街停車場至善化六份寮東勢宅及鹽水港街至樸仔腳街（今嘉義朴子）的輕便鐵路。<sup>123</sup> 雖然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最先使用輕便鐵路來運載甘蔗，但是鹽水港製糖卻是臺灣第一條開放載客營業的糖鐵。<sup>124</sup> 輕便鐵路的經營，讓王雪農的交通運輸業也由海運進一步往陸運發展。

另一方面，臺灣魚塢主要分布在嘉義、臺南以及鳳山三縣內，以臺南府城南北地方為最。<sup>125</sup> 魚塢養殖雖然成本高、風險大，但是相較於農耕，利潤也較高。自道光朝以來，臺灣西南沿海的倒風和臺江內海浮復，臺灣道陸續招墾海埔新生

<sup>122</sup> 資本額分配，臺南11萬圓、關帝廟4.5萬、大目降5萬、灣裡3.5萬、焦〔噍〕吧呷和安平各5,000圓。〈臺南通信 臺南製糖會社設設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3月27日，第2版；〈臺南製糖會社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5月24日，第3版；〈臺南通信〉，《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8月18日，第2版。

<sup>123</sup> 鹽水港製糖會社的輕便鐵道是由義竹圍庄二竹圍至東後寮庄5.04公里（2,799.1間）。在樸仔腳道分歧點至布袋嘴道的埤仔頭庄長3.6公里，從布袋嘴道分歧點至頭竹圍道內竹竹圍庄長1.8公里，總面積5,799坪。8月通過申請。〈臺南製糖株式會社輕便鐵道敷設用トシテ道路使用許可ノ件〉（1905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866002；〈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出願二條ル輕便鐵道布設トシテ道路使用許可ノ件〉（1905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1080012。

<sup>124</sup> 1902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最先築成兩條運蔗的臺車線（輕便軌道，人力推送，軌距1.75呎），由於臺車軌條較輕，無法用機關車拉動，1905年改用機器動力。1909年5月，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最先開辦「新營—鹽水港」糖鐵載客。糖鐵即五分車，軌距2.6呎，軌條較重。李方宸，〈臺灣糖業鐵路經營之研究（1946-198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13-14；謝國興，〈殖民地期台灣における鉄道・道路運輸業：朝鮮との初期的比較を兼ねて〉，收於堀和生、中村哲編著，《日本資本主義と朝鮮・台灣：帝國主義下の經濟變動》（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4），頁235-236。

<sup>125</sup> 曾品滄，〈塢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19:4（2012年12月），頁24-25；林玉茹，〈進口導向：十九世紀臺灣海產生產與消費〉，《臺灣史研究》25:1（2018年3月），頁67。



地，南部地區的富商、巨紳相繼投資魚塭，累世經營者也不少見。即連怡記洋行買辦張仰清（張烏豆）、陳北學以及郊商石鼎美家族等均參與，尤以府城紳商特別顯著。<sup>126</sup> 來到臺南的王雪農，也很快地看到魚塭的巨利，於 1904 年 5 月試圖經營魚塭，而詳細地提出設計書，向臺灣總督府申請開發官有海埔地鄭仔寮庄魚塭 113,446 坪，預定修築堤防，租借 20 年，一年一甲租金 3.5 圓。由於鄭仔寮位於鹽水溪口到運河之間（民權路四段）的偌大地域，<sup>127</sup> 涉及海防，臺灣總督府還為此行文馬公要港部司令部，最後准許王雪農的開發案。1907 年 2 月，成功開發四甲多魚塭，租金也降為一年 2.5 圓。<sup>128</sup> 由此再次見證，王雪農善於觀察時勢，與總督府打交道，而得以新創魚塭事業。

總之，與傳統固守於唐人街的華商或是那些僅與中國內地進行貿易的臺南郊商不同，在日本橫濱長期居住經商的陳中和和王雪農，不僅精通外語，而且在日本、香港以及中國之間進行跨國貿易，早在 1880 年代已經引入受到英國公司法影響的「公司體制」，更趁乙未巨變，臺南大紳商紛紛內渡中國、商界真空之際，由王雪農入主臺南，擴張和興派的地盤，成立德昌公司，經營進出口貿易和航運業。陳中和和王雪農也聯手經營傳統或新式事業。王雪農更根據新頒布的銀行條例，成立第一家以臺灣人資本為中心的農商銀行。其次，東家和雇員的事業空間不僅重新布局，而且區隔清楚，1903 年王雪農積極創設的新式製糖會社僅限於臺南地區，而沒有南下跨足鳳山地區。

#### 四、邁向臺南第一「豪富紳商」之路

1914 年 4 月，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授與王雪農紳章，且列名臺南廳第一號，資產約 30 萬圓，臺南本地無人可以與之匹敵，<sup>129</sup> 成為名副其實的臺南第一

<sup>126</sup> 林玉茹，〈瀉湖、歷史記憶與王爺崇拜：以清代鯤身王信仰的擴散為例〉，《臺大歷史學報》43（2009 年 6 月），頁 55-56；曾品滄，〈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頁 30-34。

<sup>127</sup> 比對計畫書的地圖及現地田野調查，王雪農開發的魚塭是今日南至民權路四段（舊運河），東至華平路，北至鹽水溪。筆者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田野調查。

<sup>128</sup> 〈王雪農官有海埔ヲ養魚池二埋立ノ為貸下願許可ノ件（臺南廳長外一名）〉（1907 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1298040。

<sup>129</sup> 〈紳章付與ノ件〉，《臺灣總督府府報》596（1914 年 10 月 3 日），頁 7；〈紳章附與〉（1914 年），《臺

「豪富紳商」，亦即不僅擁有最雄厚的財力，而且也是「頭號」仕紳。王雪農邁向臺南第一富紳之路，其實早在 1905 年之前已經奠定。本節主要討論王雪農出身「累世農戶」，父親還兼作漁夫，<sup>130</sup> 卻能從順和行職員做起，再以打狗商人身分入主臺南，短短幾年之間向上流動，成為臺南商界和實業界領袖以及代表性仕紳，是如何達成的？以下，首先證明 1900 年以前他已經是臺南第一富豪；其次，論證他不僅迅速累積財富，還以外來者身分打入臺南地方領導階層，變成重量級仕紳。最後，分析其致勝策略為何。

### （一）臺南第一富商

誠如前述，1896 年 12 月，王雪農才進入臺南經營德昌公司，其中砂糖貿易是最重要的業務。在日本糖商未進入臺灣之前，砂糖貿易主要控制在外商和臺灣人手中。根據 1897 年臺灣各縣的調查，臺灣人對於糖業的投資，僅有臺南縣、嘉義縣以及鳳山縣有超過 1.5 萬圓資本的製糖業者。其中，臺南縣有 11 個商號有能力釋出 15,000 圓貸款給中間商和糖商，德昌號就是其中一家。<sup>131</sup> 翌年（1898），《臺灣日日新報》已經指出「臺南縣商人德昌號，於商賈中，頗稱殷實，是以素封之名，馳聞遠邇」；在以輪船經營的南北郊貿易上，「各商家咸推其為巨擘」。由於在臺南商界已經打出名聲，1898 年 12 月，總督府事務囑託安江稻次郎透過各縣主要紳商調查臺北、臺中以及臺南三縣商工業時，在臺南除了蔡國琳、許廷光、周鳴求（和興公司當事）之外，王雪農也列名其中。<sup>132</sup> 短短一年半期間，王雪農已躍居臺南商人翹楚之一。

1899 年 5 月，根據殖民政府對臺灣商人及其交易銀行的調查，王雪農的資產已達 20 萬圓，其他包括石謨記（原郊商石鼎美家族）等臺南本地商人的資產從

---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2254004。

<sup>130</sup>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309。

<sup>131</sup> 嘉義縣僅麻豆街的林塗。臺南縣的 11 家糖商是順裕、德昌、怡順、景祥、寶源、泉益、鑑成益、惟善、順記、啟泰、福裕。鳳山縣僅有和興公司，卻可以貸款高達 220,000-230,000 圓。大藏省理財局，《臺灣經濟事情視察復命書》，頁 220。

<sup>132</sup> 〈輪運頓興〉，《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8 月 14 日，漢文報第 5 版；〈會計得人〉，《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11 月 20 日，漢文報第 6 版；〈事務屬託安江稻次郎臺北外二縣商工業調查復命書〉（1899 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403001。

2 萬至 10 萬圓不等。<sup>133</sup> 才到臺南經商不到三年之間，王雪農顯然已經是臺南市街第一富豪。

王雪農除了迅速累積資產，變成臺南第一富商之外，在日本新式製糖會社和三井等大企業進來之前，也迅速奠定臺南第一大糖商的地位。李佩蓁認為，日治初期陳中和和王雪農經營砂糖貿易的實力並沒有超過陳北學，但是並沒有舉出具體的數據。<sup>134</sup> 由表一可見，1899 年臺灣各商號輸往日本的砂糖數量，依序是怡記洋行 25%、海興公司 22%、和興公司 13%、德昌公司 12%、德記洋行 10%、陳北學順源號 10%以及捷興公司 8%。其中，德昌號是臺南出口砂糖到日本唯一上榜的貿易公司，如果加上他與陳中和及英商合資的海興公司，以及本調查時捷興公司是德昌的支店來看，所控制的砂糖出口量更高，遠比陳北學的順源號來得高。

1900 年，日本糖商津田靜一和關組來到臺灣，但「資金微少」，臺灣商人仍可以維持其清末的優勢，王雪農是僅次於陳中和的大糖商；1900 年報紙已經稱他

表一 1899 年輸出砂糖到日本的洋行和糖商

商號名	地點	店主	砂糖數量(斤)	比例%	價格(圓)	交易銀行
德記洋行	打狗	Al. S. Ollie	341 萬	10%	16.9 萬	印度特許銀行
怡記洋行 (Bain & Co.)	打狗	Bain	833 萬	25%	39.2 萬	香港上海銀行
海興公司	打狗	陳中和、王雪農、Hastings	732 萬	22%	34.3 萬	三十四銀行
和興公司	打狗	陳中和	443 萬	13%	22.8 萬	香港上海銀行、橫濱順和棧
德昌號	臺南	王雪農	416 萬	12%	22.3 萬	橫濱七十四銀行、三十四銀行、香港上海銀行
陳捷興號	打狗	臺南德昌號支店	267 萬	8%	14 萬	
陳順源號	打狗	如同臺南怡記號的支店	343 萬	10%	14.4 萬	
合計			3,375 萬	100%		

資料來源：川北幸壽，《臺灣金融事情視察復命書》，頁 137-140；〈南部經濟界的實情（三）〉，《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6 月 6 日，第 2 版。

<sup>133</sup> 〈本島商賈ノ資本業體及取引銀行調臺灣銀行へ送付〉(1899 年)。

<sup>134</sup> 李佩蓁以德記行資本 75 萬圓，似乎直接將德記洋行視作陳北學產業，仍待商榷。另一方面，他也忽略了王雪農和陳中和還合資海興公司，砂糖輸出佔有率非常高。李佩蓁，〈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頁 46-47。

是「臺南豪商」。<sup>135</sup> 1902年，臺灣糖商出口100萬斤者，王雪農列名第一，陳中和、方慶佐分居二、三。1903年，南臺灣主要砂糖出口商中，臺南則僅有方慶佐的德記號和王雪農的德昌號列名，各有營業資本額5萬圓。1904年12月，南臺灣新糖第一次運出，由日英丸負責從安平運至日本約2,000擔。其中，德昌佔1,000擔，德記洋行587擔以及日本香野洋行400擔。<sup>136</sup> 臺南新糖運出，德昌不僅拔得頭籌，而且佔一半出口量，王雪農穩坐臺南第一大砂糖出口商寶座。也因此，1905年8月，臺南三郊組合公廟水仙宮舉行盂蘭盆會，糖郊大籤是由德記、德昌兩商號擔任。<sup>137</sup> 德昌號已經與老字號德記並列，顯現其在糖郊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1905年以前，德昌號也是臺南米穀對日貿易最有勢力的商行。1902年秋天，日本因為米穀減收，從9月至翌年（1903）2月，臺南運載近120萬公斤（2萬俵）的糙米到橫濱、神戶。出口米商之中，德昌出口數量位居第一，幾乎佔總出口量一半，也是第二順位的臺灣貿易會社的2.3倍，香野支店則排居第三。<sup>138</sup> 德昌號不僅是臺南最大的米穀出口商，連日本糖商都無法與之競爭。

## （二）臺南代表性仕紳地位的奠立

1890年代末，王雪農不但是臺南富豪，而且也晉身當地代表性仕紳之列。1898年，殖民地政府任命王雪農為「城外保甲評議員」，顯見他在臺南進出口商群集的大西門城外的地位；9月，為了調查地方稅賦，設置調查委員，臺南縣由縣長任命24名，其中臺南本地人14名，「均於士林中選舉」，王雪農即是其中一人。<sup>139</sup> 在臺南縣官廳眼中，王雪農已是地方重要仕紳。

1899年7月，臺南富紳蔡夢熊、許廷光、蔡國琳、吳子周以及王雪農等，倡議要成立臺南縣城市商賈、紳士以及官民的「俱樂部會」，以兩廣會館為聚會場

<sup>135</sup> 1900年日本糖商以津田靜一和關組「為重鎮」。〈糖金相繫〉，《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2月16日，第5版；〈觀光旋返〉，《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7月21日，第4版。

<sup>136</sup>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東京：三秀舍，1905），上卷，頁208；臨時臺灣糖務局編，《糖業記事（第2次）》，頁101；〈南部新糖の初荷と相場〉，《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2月6日，第2版。

<sup>137</sup> 〈臺南通信 臺南盂蘭盆會〉，《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8月24日，漢文報第4版。

<sup>138</sup> 德昌運9,391俵，臺灣貿易會社是4,000俵，香野3,613俵，還有其他各商店1,026俵。〈臺南通信 玄米の內地輸送〉，《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2月18日，第2版。

<sup>139</sup> 「王雪農履歷書」；〈委員任命〉，《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9月25日，第5版。

所，進行「官民偕歡」聯誼，最初在縣廳的斐亭開第一次會議。<sup>140</sup> 這個俱樂部顯然是由臺南大紳商所發起，王雪農也參與，應是這些紳商要借重他精通日語又瞭解日本文化，擅於與總督府、地方廳或日本企業家交流，不過之後似乎不了了之。但由此突顯，王雪農以文化仲介人的身分，已經打入臺南地方富紳階層。

1899年，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為了籠絡臺灣仕紳，仿效清代鄉飲酒禮設置「饗老委員」一職，10月臺南選出15位委員，王雪農是其中一員。<sup>141</sup> 饗老委員大都出自臺南縣內的名望家族或是地方知名仕紳，王雪農以外來者、商行職員出身卻能躋身其中，顯現其儼然已經成為代表性仕紳之一。

事實上，日本統治臺灣之後，蔡國琳和許廷光可以說是臺南最具份量的仕紳。1898年11月，當以王雪農為首的城外郊商、買辦組成臺南三郊組合之後，翌年6月以許廷光、蔡國琳等城內商人為主，發起配合兒玉總督新政而成立臺灣殖產會社，兩組織成員完全沒有重疊，似乎有互別苗頭之意味。許廷光還因應臺北成立婦女解纏足的天足會，號召臺南紳商於武廟三官堂創設臺南天足會，<sup>142</sup> 突顯其作為臺南領頭仕紳的地位。不過，之後並沒有特別運作，1903年天足會運動重興，以吳道源、陳鴻鳴以及王雪農為首向臺南廳申請設立天足會，並希望從街庄長擴及所有居民均加入該會，最後地方紳士推舉王雪農為會長。<sup>143</sup> 連吳筱霞、謝石秋等文人（附表一）都認同王雪農，顯見他似乎已經取代許廷光、蔡國琳，儼然成為臺南第一仕紳。

### （三）原因分析

黃懷賢認為王雪農從一介職員，變成臺南地區商業領袖，最大轉捩點是1895

<sup>140</sup> 〈俱樂部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7月2日，第5版。

<sup>141</sup>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165；呂紹理撰，〈王雪農〉，收於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363。臺南委員如蔡國琳、蔡夢熊、許廷光、李廷光、葉瑞西、羅秀惠、王藍石、吳子周、陳修五、葉芷正、林文賢、黃修甫……等。〈饗老委員〉，《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0月13日，第3版。

<sup>142</sup> 發起人還包括蔡夢熊、葉瑞西、黃修甫、沈鴻傑、姚星輝、打狗旗後街林璣章、阿猴街蘇雲梯以及阿單霧（霧峰）曾君定。中神長文編，《臺南事情》，頁95-96、99-103、110-114。

<sup>143</sup> 〈天然足會再興〉，《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9月15日，第3版；「王雪農履歷書」。

年因為協助日軍登陸，贏得日本政府信任所致。<sup>144</sup> 作為殖民政府協力者，當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臺南本地紳商迎接日軍、協助抗日者大有人在，例如前述許廷光不僅迎接日軍入臺南城，而且極力協助殖民政府打擊武裝抗日者，<sup>145</sup> 王雪農最後仍取代許廷光，變成臺南第一富紳，其致勝原因不僅是良好的政商關係，以下從經商天賦、政府協力者、跨國貿易以及文化仲介等面向來分析。

首先，企業主是否具有企業家素質，<sup>146</sup> 攸關事業成敗，陳福謙和王雪農的企業經營史彰顯了這個事實。由於兩人均不到 50 歲即英年早逝，後代卻沒有像他們一樣的能力持續經營，<sup>147</sup> 最後功敗垂成。王雪農的經商天賦和個人魅力，1898 年《臺灣日日新報》如下的觀察，非常中肯：

自少游東洋，旅居十餘載，嫻熟內地語言，與內地商人往來無間，較他商為親密。又精於會計，理財得法，營業關頭，如視諸掌，且其平素作事，甚有把握，處人和氣可掬，交易公平，在地諸商亦樂與之晉接，其材幹如此，宜乎商業之振興，足以獨當一面也。<sup>148</sup>

勇於學習外語，交遊廣闊，精於理財，處事公平的人格特質，讓他得以透過國際貿易、良好的政商關係以及作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政治和企業文化仲介，而迅速地獨當一面，成為一方之豪富商紳。

親身參與跨國貿易，不僅讓王雪農理解日本明治政府的進步面貌，進而掌握契機，趁亂之際回到臺灣，變成殖民政府的協力者，一方面奠定良好的政商關係，

---

<sup>144</sup> 黃懷賢，〈臺灣傳統商業團體臺南三郊的轉變（1760-1940）〉，頁 53。

<sup>145</sup> 1895 年，許廷光與蔡夢熊、楊鵬搏及英國傳教士到赤竹仔莊向日本軍司令部表誠；1897 年因勸服欲襲擊臺南的「土匪」歸順日本有功，獲樺山總督授紳章；1898 年探知鳳山、阿緞一帶的「土匪」棲息在溪州庄後，便繪圖帶領高井縣知事前往討伐；1899 年，潮州庄「土匪」調查又奏大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下載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網址：<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

<sup>146</sup> 張仲禮指出，企業家素質指遠大膽略、敏銳眼光、組織才能以及創新意識等有關企業成效的企業家精神。張仲禮，〈略論旧中国外资企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收於張忠民、陸興龍主編，《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頁 27。

<sup>147</sup> 王雪農雖有妻妾四人卻無出，收養兩個螟蛉子王國賓、王國相，但「非克家之器」。〈運棺歸葬〉，《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9 月 28 日，第 6 版。

<sup>148</sup> 〈會計得人〉，《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11 月 20 日，漢文報第 6 版。

有利事業發展；另一方面，從地方官廳到總督府也變成他取得地方仕紳身分和事業版圖擴張的奧援。

除了前述乙未之際王雪農因為精通日語，協助日軍「徵餉募役」因此而「立身興家之基」外，<sup>149</sup> 鳳山廳開廳之際，廳長柴原龜二率部屬到苓雅寮，王雪農協助巡視、安撫當地居民。遷往臺南發展之後，也為地方官員重用，1898年受委任為臺南縣第二公學校委員囑託，城外保甲評議員以及臺南辦務署營業稅調查委員。1899年，則擔任臺南廳殖產勸業委員囑託，1900年為城外衛生局副主理、臺南地方法院的舊慣研究會委員。1904年又擔任愛國婦人會顧問、開山神社董事。<sup>150</sup> 由於王雪農通曉日語，受到日本統治者的重視，不僅協助總督府和地方官廳治理臺灣，更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臺灣人之間的政治文化仲介者，也因此得以獲得臺人倚重，且不斷擴張其日、臺紳商網絡。

另一方面，與清代臺灣相同，要成為地方代表性紳商，必須投入地方公益事業。除了前述被選為臺南天足會理事長之外，1902年王雪農參與澎湖賑濟，1904年捐贈安平公學校1,000圓以及苓雅寮公學校全部土地，因而獲得總督府賞賜木杯、銀杯。<sup>151</sup> 正由於為總督府和地方官廳立下各種「功勞」，王雪農又懂得跟隨日本法制，援引銀行條例，而得以爭取成立第一家臺灣人資本為主的民間銀行，善用臨時糖務局的糖業獎勵政策，取得資金來創立新式製糖株式會社、經營輕便鐵路，並向臺灣總督府申請開發官有海埔新生地，開創魚塢事業。

其次，透過國際貿易，王雪農得以由苓雅寮順和行和興公司的同鄉網絡，進而建構往外國以及臺灣本地擴張的貿易及企業網絡。德昌公司即大半透過苓雅寮的同鄉網絡而創立，股東和副當事以及初期營運的中式帆船金德順號船主都是苓雅寮人。王雪農也與陳福謙家族的陳北學和陳文遠建立良好關係。1898年，陳北學的邦記號要運米至基隆販賣，即透過德昌公司以淡水丸配運米到基隆；1908年，陳北學過世時，其家族聘請王雪農擔任監護人（後見人），<sup>152</sup> 由此可見雙方關係之密切。陳文遠則與王雪農合作，創設臺灣農商銀行。順和行的陳福謙家族

<sup>149</sup>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309。

<sup>150</sup> 「王雪農履歷書」。

<sup>151</sup> 「王雪農履歷書」。

<sup>152</sup> 〈恐喝取財後報〉，《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5月3日，第3版。

顯然是王雪農事業的主要客戶以及金主之一。

然而，與陳中和的合作關係，才是王雪農事業創始最重要的奧援。除了前述相關的合夥事業之外，兩人還共同運貨、提訴，甚至一起向殖民政府抗爭請願。1899年3月，德昌與和興公司三艘帆船運載木棉往廈門販賣，卻被海盜搶去，即一同去廈門提告，日本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也出面保護。1901年，砂糖消費稅頒佈之後，陳中和聯合王雪農等製糖會社及糖商，共同連署，向臺灣總督府請願，抗議海關檢查所產生的弊端。<sup>153</sup> 陳中和和王雪農採取傳統商業結幫經營方式，來面對各種的貿易風險和困難。

王雪農獨立創業時，一開始也學習陳中和的事業模式，經營貿易公司、帆船航運業、鹽務以及新式碾米業。更重要的是，依附在陳中和所構築的順和行、和興公司商業網絡，而得以與橫濱增田屋的安部幸兵衛建立關係。在橫濱所建立的外商網絡，也有利於新事業的經營。舉例而言，1904年3月，王雪農透過1876年在橫濱設立支店的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 Co.）購買製糖機器。<sup>154</sup> 此外，又與陳中和一起捐款重修長崎天后宮，進一步建立與長崎泰益號的糖、米委託販賣關係。

王雪農也與陳中和一樣，建構起與中國、英國的跨國商業網絡。<sup>155</sup> 這也是為何德昌公司有中國股東黃肇記，又與英商Hastings家族合資經營砂糖貿易的海興公司及新式碾米業的南興公司。晚清時期，臺灣商人皆以買辦身分與外商合作，甚至出現「小洋行大買辦」現象，<sup>156</sup> 即使在南臺灣控制大半糖業的和興公司也不得不以買辦身分作為保護傘，免於受地方官府的覬覦。<sup>157</sup> 日本統治之後，陳中和

<sup>153</sup> 〈廈洋海盜〉，《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3月2日，第3版；〈三十四年律令八號改正の請願〉，《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11月19日，第2版。

<sup>154</sup> 〈糖業獎勵金下付二關シ臨時臺灣糖務局へ指令（指令第九六八號）〉（1904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817001。三美路商會是1834年由猶太人Marcus Samuel在倫敦創立M. Samuel & Co.，1876年在橫濱設立支店，從事米穀貿易，也是歐美機械廠商的總經銷，特別是供應鐵道部所需的機械。三美路商會與日本政府有良好關係，而取得臺灣樟腦外銷總經銷權及提供鴉片原料，1897年來大稻埕六館街設立支店。鍾淑敏，〈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25:2（2018年6月），頁97-105。

<sup>155</sup> 1897年，和興公司的資本仍以本地人為主，也有中國人和2、3位外國人投資，資本額達1百萬圓。〈本島糖業調查書〉（1897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181001，頁94-95。

<sup>156</sup> 詳見：李佩蓁，〈地方的視角：清末條約體制下臺灣商人的對策〉（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20）。

<sup>157</sup> 買威令著、林滿紅譯，〈清末南部臺灣的蔗糖業〉，頁142。



和王雪農即轉以合夥關係，與英商共同經營糖、米生意，再次突顯他們獨特的國際見識，應是最早與外商合夥投資事業的臺灣商人。

除了上一節南臺灣企業網絡的擴張之外，王雪農最先擴張本島網絡到臺北。他經常親自至日本的橫濱、東京、神戶、大阪及中國各地考察，且一待 2 至 4 個月，1903 年首度遠赴馬尼拉視察 3 個月。<sup>158</sup> 出國考察由臺南北上至臺北，就是他擴展本島網絡的最佳時機。舉例而言，1899 年 6 月，王雪農要由大稻埕搭輪船往廈門視察商務。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還特別接待，邀請辜顯榮、李秉鈞、陳洛、王慶忠、劉廷玉等臺北重要紳商作陪；又因為「素喜結納友朋最多」，在臺北停留時，「凡有交情，莫不設筵相饗」。<sup>159</sup> 作為一個貿易商人，懂得透過各種機會來結交朋友，擴張人際網絡，這也是為何他可以將航運業進一步往淡水擴張，並將輪船賣給辜顯榮。大抵上，與蔡國琳等眾多臺南紳商不同，王雪農致力於擴張全島性的人際網絡，不僅得以獲得資金支持，交流情報，更成為未來其本島事業版圖跨出臺南地區的重要助力。

藉由在日本、香港以及中國的跨國貿易經驗，王雪農瞭解全球趨勢，吸取最新知識，德昌公司雖模仿和興公司體制設立，但是又有所創新。在長達 17 條的「合約股字」中，註明「起號德昌公司」；發給股東「股票」作為股份和繼承憑證；而且股東公舉王雪農和同是苓雅寮庄、經營糖米行德瀛號的何德修擔任正、副「當事」，另設立無給職的「協理人」，由陳峰記、陳禮記出任；並詳細載明資本構成、當事職權及薪資、盈虧責任、收益分配、設立公積金、股東借貸、股份出讓、帳目稽查、事業結束以及從經營者到股東各種企業倫理的規範。<sup>160</sup>

與傳統合股商號相當簡單的契約內容大不相同，德昌公司揭櫫更多現代公司

<sup>158</sup> 透過旅行券可見，1899 年至 1901 年之間，王雪農時常出國考察。往中國視察的地點包括廈門、福州、汕頭、廣東、上海、寧波、香港，他最常去廈門、福州以及香港。〈1899 年 7-9 月外國行旅券下付表及返納表〉，《臺灣總督府旅行券下付及返納表》（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識別號：T1011\_01\_010；〈1901 年 10-12 月外國旅行券下付表及返納表〉，《臺灣總督府旅行券下付及返納表》，識別號：T1011\_02\_004；〈1903 年 7-9 月外國旅行券下付表及返納表〉，《臺灣總督府旅行券下付及返納表》，識別號：T1011\_02\_011。他去馬尼拉考察一事，也見於：黃智偉主編，《美國駐臺領事館檔案輯成 1887-1941》（臺北：悠傳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14），第 1 輯第 4 冊，頁 174-177。

<sup>159</sup> 〈略分言情〉，《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6 月 13 日，第 3 版；〈設筵告別〉，《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6 月 16 日，第 4 版。

<sup>160</sup>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 3 卷下，頁 7-8。

組成的精神和規範。值得注意的是，規定股東所繳的資本額每年固定給利息銀之外，如有「另附銀在本行內放息者」，每年可以得 10% 的利息。換言之，除了持股之外，還可以放息。其次，正、副當事不僅固定領月薪，而且與協理人一起分配紅利，作為「蔭份」。又以紅利中的 5% 做為公積金，賞給伙計，其餘由股東均分。第三，當事「掌握全盤生理」，而且除了管銀人（帳房、會計）由股東公舉之外，可以與協理人磋商，掌控伙計人事任命。<sup>161</sup> 這個合股契約與 1895 年成立、同樣來自和興公司派的捷興公司（外號唻記棧）的契約，確實主要源自和興公司，除增設協理人之外，<sup>162</sup> 新增公積金、股票繼承以及更縝密的企業倫理規範。德昌公司較和興公司體制更上一層樓，已經區隔出資人（資本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專業經理人），而且跳脫家族籌資的束縛，協理人制度更是受到日本、香港及其他英國領地商業法的影響而出現，並非臺灣傳統商業習慣。<sup>163</sup> 與光緒年間瑞興洋行或府城石謨記等成立的合股商號契約相比，<sup>164</sup> 更突顯出德昌公司在資本籌措及治理結構上的優勢，不僅融合中國、日本以及西方企業組織模式，而且兼採傳統與現代企業的優點，他又懂得透過銀行融資，促使王雪農初期事業旗開得勝，迅速躍居臺南第一富豪。

除了公司制度之外，王雪農一開始也聘用日本職員江口音三協助營運，<sup>165</sup> 對於拓展對日貿易或與殖民統治者交涉均具有利基。充分運用日本或是英國等人力資源，是他之後發展新式事業的重要助力，這也是府城傳統商人無法與之匹敵的因素之一。

王雪農的事業最初大半與東家陳中和類似，但也有他新創的部分。例如，他經營輪船航運業、最先設立製糖株式會社、投資開發官有海埔地為魚塢、設立第一家臺灣人資本為中心的民間銀行，以及積極透過商會做為橋梁連結總督府、地方廳以及在地紳商，擴展事業版圖。其中，商會如何成為其發展事業和仕紳地位

<sup>161</sup>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3卷第4編下，頁7-10。

<sup>162</sup> 李佩蓁，〈國際貿易與臺灣糖商的轉型：以打狗陳福謙家族為例，1860-1905〉，頁66。

<sup>163</sup>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3卷下，頁179。

<sup>164</sup>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3卷下第4編，頁3-5、20。

<sup>165</sup> 〈略方言情〉，《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6月13日，第3版。

的平臺，值得加以說明。

陳中和雖然於 1896 年 11 月在打狗設立內外國民俱樂部，以共同促進打狗的繁榮，<sup>166</sup> 但與創設信用組合一般，最後似乎不了了之。俱樂部起源於十七世紀的英國，1863 年引入橫濱外國居留地，而以日本人為中心設立的俱樂部，最早應始於 1872 年築地的自然俱樂部。1880 年代後半，日本普遍出現俱樂部。<sup>167</sup> 換言之，俱樂部也是陳中和和王雪農在橫濱學習到的明治維新新事物。不過，王雪農似乎更加偏好此時期東京和大阪巨商、企業近代化先知澀澤榮一或五代友厚組織的商工會議所，<sup>168</sup> 亦即集結商人組成同業組織，以便改善商業環境，促進產業發展。1898 年至 1905 年之間，他先後發起成立三郊組合、糖商工會以及臺南商工會。其中，尤以三郊組合與其初期事業的發展關係最密切，充分展現他不但是糖業的「捐客」，而且是政治和商業文化的仲介者。

1898 年 12 月至 1899 年 2 月，臺灣總督府事務囑託安江稻次郎奉命調查臺灣商工業發展，認為臺灣與日本商業慣習有所落差，1890 年制訂的「商業會議所條例」不適用於臺灣，後藤新平遂決定臺灣人和日本人各自成立商業團體，三郊得以復興。1899 年 11 月，或許在總督府授意之下，王雪農「以振作商務為念」，召開三郊總會，擔任正會長（或稱組合長），制訂 14 條規約，並聘任日籍顧問、地方官長以及銀行總經理作為三郊名譽顧問，三郊架構大幅改變。三郊組合的基礎，大多奠基於王雪農擔任組合長時期，包括三郊組合化、向臺灣總督請願統一貨幣，請求歸還遭地方廳侵佔的義民祠公產，以及改善臺南地區的商業環境。<sup>169</sup> 特別是王雪農因為深知如何與日本地方官員交涉，討回三郊產業，更加奠定他在臺南的地位以及顯現總督府對他的禮遇。

<sup>166</sup> 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頁 101。

<sup>167</sup> 川北稔，〈開かれた外交・閉じられた：コーヒーハウスからクラブへ〉，收於川北稔編，《結社のイギリス史：クラブから帝国まで》（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頁 98-99；橋爪紳也，〈俱樂部的成立〉，收於福田アジオ編，《結衆・結社の日本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6），頁 232-238。

<sup>168</sup> 明治維新時期，東京和大阪商界各有澀澤榮一和五代友厚作為企業現代化的指導者，引入商工會議所，而有「東有澀澤，西有五代」之稱譽。津川正幸，〈五代友厚と堂島米商会所：明治 13 年 3 月，4 月限売買中止一件〉，頁 1；毛利敏彦，〈大阪商業講習所の誕生と福澤諭吉：大阪市立大学事始め〉，《近代日本研究》（東京）2（1985 年 3 月），頁 216。

<sup>169</sup> 「王雪農履歷書」；黃懷賢，〈臺灣傳統商業團體臺南三郊的轉變（1760-1940）〉，頁 54。

三郊不僅成為成員瞭解日本法規制度的平臺，<sup>170</sup> 更是王雪農用來連結地方紳商、地方政府以及臺灣總督的重要舞臺。舉例而言，1899年11月，臺南縣參事蔡國琳、蔡夢熊、許廷光、李廷光、葉瑞西等領銜的臺南縣紳商歡迎兒玉總督的宴會，蔡國琳代三郊會唸頌德表，王雪農由於是會長得以參與。兒玉總督又出席臺南孔廟的農產物品評會頒獎典禮。<sup>171</sup> 王雪農為賣方總代表，蔡國琳為人民總代表，之後在四春園慰勞20名的饗老典委員。王雪農也邀請臺南縣磯貝靜藏知事、森尾茂助書記官及縣廳高等官河原元之助（臺南地方法院檢察官代理）等參加三郊組合的宴會，甚至請知事訓示。透過三郊的運作，他也屢屢向總督府建言，而被認為在「臺南經濟界有引燃勢力」。<sup>172</sup> 由此可見，王雪農以三郊組合做為平臺，不僅是名副其實的臺南商界領袖，而且也是臺灣總督、地方官廳以及在地重量級紳商之間的文化仲介者。

總之，過去研究往往僅注意到商人的政商關係，卻很少關注像王雪農這樣，透過長期在日本經商的經歷，成為「本島人中對於內地事情最瞭解的人」，甚至被稱為具有「日本主義」的商人。<sup>173</sup> 他以日本殖民政府、企業家與臺灣紳商之間的文化仲介身分，一方面是臺灣總督府特別扶植和倚重的臺南商人；另一方面，因精通日語、瞭解日本文化，變成臺南商界代言人，進而擴張事業版圖。此外，他又善用中、日、英及在地網絡、銀行融資來籌集資本，以新秀之姿迅速竄起，而贏得作為一方富紳的地位。

## 五、結論

本文以清末至日治初期王雪農如何以打狗順和行職員變成臺南第一富紳的

<sup>170</sup> 黃懷賢，〈臺灣傳統商業團體臺南三郊的轉變（1760-1940）〉，頁48-50。

<sup>171</sup> 有關此會的重要性和意義，參見末武美佐，〈產業獎勵的試行：1899年臺南縣農產物品評會〉，《臺灣文獻》68:4（2017年12月），頁43-80。

<sup>172</sup> 〈歡迎宴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1月15日，第5版；〈臺南通信 三郊〉，《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1月30日，第2版；〈臺南と兒玉總督〉，《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1月22日，第2版；〈臺南三郊組合臨時會〉，《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8月26日，第2版。

<sup>173</sup> 〈島内の砂糖商狀〉，《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2月1日，第4版；〈臺南通信 保險と爲替も亦急務なり〉，《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8月30日，第3版。

向上流動為例，有以下觀察。首先，過去以來，較少注意到 1870 年代之後這一群親自到日本、香港進行跨國砂糖貿易的打狗商人，對於晚清臺灣商業文化所進行的改造及其歷史意義。他們由於精通外語，逐漸建構日本、英國、中國以及東南亞的跨國人際和事業網絡；又通曉國際大勢，最先受到十九世紀末葉英國公司法引入香港的影響，設立「公司」（洋行），首創合理而縝密的股份合資契約。他們又懂得向銀行融資、代辦外商保險業務，以進行國際貿易，迅速累積財富。在他們的影響之下，1890 年代末，除了基隆之外，臺南是全臺向外商銀行融資的重地，臺南和打狗商人也最先向臺灣總督府提出新設銀行。

其次，與從來固守於唐人街或那些僅進行兩岸貿易的臺南商人不同，由於他們長期在橫濱經商，又往來於大阪、神戶以及長崎等商業重鎮，對於日本企業文化，特別是明治維新有最真確的觀察。也因此，當臺灣因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紳商巨族紛紛內渡中國之際，陳中和和王雪農等打狗商人卻反向積極協助日軍登陸，打擊臺灣漢人武裝抗日。相對地，臺南三郊商人因為大多與中國沿海各地貿易，透過帆船或是輪船信局的情報網，可以比其他更快地風聞種種謠傳，仍停留在「倭寇日本」的文化偏見與想像中，且往往在原鄉有產業、宅地，以致於府城是全臺各地商人內渡比例最高的城市。也因此，臺南商界幾近於真空，具有跨國貿易經驗和國際視野的王雪農，遂趁亂之隙來到臺南開張德昌公司，陳中和的和興公司派勢力也一舉進軍臺南。跨國貿易的經驗和知識很明顯地影響商人對日本的異族觀和去留選擇，也造就了明治時期「打狗陳中和，臺南王雪農」南臺灣兩大豪商的局面。

再者，1896 年 12 月，才進入臺南經營貿易公司的王雪農，短短幾年之間，以累世農戶出身和外來者身分，逐漸變成臺南第一富豪和代表性仕紳，除了他的經商天賦和個人領袖魅力外，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基於對明治政府的認識，他協助日軍登陸，又精通日語，成為殖民政府的協力者，而特別受到總督府和地方廳的倚重和提攜。他又懂得援用明治政府新頒布的銀行條例或殖民政府的糖業獎勵政策，因而陸續成立第一家臺灣人資本為主的臺灣農商銀行、開展鼎鼎大名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等新式製糖事業、經營輕便鐵路以及開發官有海埔新生地成魚塢。過去，我們常強調賀田金三郎等在臺日資在臺灣取得大片官有土地開發，

但卻較少注意像王雪農這樣對於日本政治文化認識甚深的臺灣商人，同樣得以向總督府申請官有地，開創新事業，甚至創設株式會社，打破過去認為日治初期臺灣人不能獨自成立株式會社的迷思。

第二，陳中和和王雪農主、雇之間輔車相依、結幫經營的現象，應是臺灣商業史首見，也是王雪農初期事業重要的助力。王雪農一方面複製陳中和的事業模式，另一方面則依附他的臺灣、中、日以及英國商業網絡，而得以經營貿易公司、航運業、參與鹽務以及創立臺灣第一家機械動力碾米公司。

第三，與同時期的臺南商號相比，王雪農透過國際貿易學習的知識，讓他得以成立更具競爭優勢的德昌公司。其體制也比陳中和的和興公司更上一層樓，不僅出資人和經理人已經分離，跳脫家族籌資的資本籌集方式，而且融合日本、西方以及臺灣傳統企業的優點，並建立更具現代公司精神的治理架構和企業倫理。作為臺灣第一代「現代商人」，採用跨國籌資組成公司、使用輪船經營航運業，又懂得利用銀行融資、代辦保險業，與英商合作創立臺灣第一家動力碾米廠，充分利用跨國商業網絡和人力資源，而成為日本統治初期臺南地區無人得以與之匹敵的豪商。

第四，與陳中和不同，王雪農像明治維新時期東京和大阪巨商、企業近代化的指導者澀澤榮一和五代友厚一般，積極利用商會。他重振三郊組合，以作為總督府、地方廳與在地紳商的溝通平臺，不僅得以屢屢向總督府建言，維護被殖民者的商業利益，成為臺灣人的代言者，而且極力改善商業環境，提升企業競爭力。進言之，他擅於以文化仲介者的身分，一方面擴張事業版圖和網絡，另一方面確立他作為臺南經濟界領袖與代表性紳商的地位。

附表一 王雪農的臺灣人網絡

時間	組織名	設置地點	參與人員	經歷
1899 年 7 月	俱樂部	臺南兩廣 會館	蔡夢熊 許廷光 蔡國琳 吳子周	臺南下橫街，20 歲舉秀才、26 歲廩生，1895 年蔡夢熊與許廷光等迎日軍入臺南城，1897 年臺南縣參事，授紳章，1899 年敘勳六等，授瑞寶章。 二老口街，1883 年考中秀才、1885 年增生、1887 年廩生。1895 年總督事務囑託、1897 年臺南縣教育幹事，臺南縣參事，獲授紳章、1898 年天足會長，臺北臨時法院鑑定委囑。仁厚境街，16 歲舉秀才、23 歲補為廩生、1892 年舉人，1897 年臺南縣參事，以臺灣總督府優恤前朝遺賢，授紳章，1900 年赴臺北參列揚文會並赴東京參加慶典，1901 年臺南廳參事。 1897 年臺南廳參事、保甲局長，1897 年授紳章。
1899 年 11 月	臺南三郊 組合（三 郊會）	臺南水仙 宮	蔡植南 方慶佐 陳明夫 郭炭來 陳炳如	原擔任買辦，怡記號，砂糖商、薑黃商人以及龍眼商人，臺南三郊組合副會長 德記號，原陳北學當事，三郊組合副會長 砂糖商，泉益號，三郊組合幹事長 寶源號，龍眼商、砂糖商，地方有力的商業家、三郊組合幹事長 吉春號，砂糖商、三郊組合幹事長
1900 年	臺南信用 組合（沒 有成立）	臺南	陳中和 吳子周 蔡國琳 許廷光 黃修甫 吳磐石 郭炭來	參見正文 同上 同上 同上 總趕宮街，20 歲秀才，清朝時期因山西賑濟捐出力，欽授藍翎，28 歲又欽授花翎，1897 年授紳章。 1897 年臺南辦務署參事，1899 年保甲局局長。 同上
1900 年 10 月	臺南糖商 工會	臺南	蔡植南 陳明夫	同上 同上
1903 年 4 月	大目降製 糖會社	臺南大目 降（新化 區）	蘇振芳 洪其標 楊彩記	大目降砂糖商，子蘇有志，1897 年授紳章，1902 任臺南廳參事。
1903 年 9 月	天足會		吳道源 陳鴻鳴 吳筱霞 謝石秋	醫生，基督徒 陳德聚堂管理人，1897 年臺南廳灣裡辦務署參事、1898 年臺南廳大目降辦務署參事，灣裡公學校學務委員、1900 年大目降辦務署善化里東區長、1902 年地方稅調查委員、1905 年善化里東區土地整理組合長。 臺南仕紳，酷愛漢詩，進士許南英門生。 父謝四圍，為臺南糖商。1891 年 13 歲府學生員，1897 年與陳渭川、蔡國琳等組「浪吟詩社」。1906 年受連橫之邀，入《臺南新報》任漢文部編輯，並創組南社。
1903 年 10 月	合名會社 臺灣農商 銀行	臺南頂南 河街	陳文遠 葉爾純	苓雅寮，陳福謙次子 打銀街集源質屋（當舖）

1903年 12月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臺南鹽水港	翁煌南 葉瑞西 黃錦興 郭浩雋 郭升如 周及三 劉神嶽 陳人英 葉澄波	嘉義，同治年間考取嘉義縣生員，又考取補增生。1895年嘉義縣參事。 1863年秀才、1864年庠生，1891年任新竹縣儒學教諭、1895年保良局長、1896年總督府授紳章，1898年臺南縣參事、嘉義縣參事。 1900年授紳章，1903年鹽水港廳總保正、1905年砂糖商，在龍蛟潭堡義竹園庄外三個地方設糖廠。 學甲堡北馬寮庄人。1892年武科秀才，1895年鹽水港區庄長，1903年授紳章。 赤十字社鹽水港委員部委員 鹽水港廳鐵線堡(臺南市柳營區)人。精經史，善詩文，1883年考取秀才。六甲及鹽水港辦務署參事、鹽水港廳及嘉義廳參事。 秀才，廩生。唐景崧撫臺之時，委辦赤山善化里東善化里西三堡採訪局，兼辦籌防局。1898年六甲辦務署參事，1899年蘇荳辦務署參事兼保甲局局長，1901年鹽水港廳參事 葉瑞西之弟，兄弟經營專事糖業生意「葉連成」商號。
1904年	臺南製糖株式會社	臺南市崁腳庄	蔡國琳 吳子周 吳道源 張文選 吳筱霞 林霽川 郭炭來 蘇有志 陳鴻鳴 鄭利記 黃鷺汀 葉爾純 陳冠英 黃股經	同上 同上 同上 牙醫生 同上 清朝武科舉 同上 大目降，蘇振芳子，1897年授紳章，1902任臺南廳參事 同上 灣裡，早年經商，曾任大潭莊長和崇德區長 臺南人，芝麻、薑黃及龍眼商人，商號金長泰。1905年任臺南廳第四區街庄長，臺灣煙絲賣捌人。 同上 苓雅寮。1906獨立經營米糖中間商萬源號商行 臺南市柱仔街

說明：三郊組合僅列出重要幹部。

資料來源：〈紳章附與〉；中神長文編，《臺南事情》，頁100-101、113-114；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頁311、333、368-369；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257-259、286、278、285-290、318；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頁65；許丙丁，〈當舖考源及臺南市質屋業〉，《臺南文化》(臺南)6:4(1959年10月)，頁27；〈俱樂部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7月2日，第5版；〈天然足會再興〉，《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9月15日，第3版；〈赤社捐金〉，《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0月21日，漢文報第2版；顏義芳，〈煙草專賣初期被指定為元賣捌人的臺灣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132(2015年3月30日)，下載日期：2020年9月30日，網址：<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32/1895>；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頁115；徐紹綱，〈蘇有志：殞落的臺灣地方仕紳〉，《臺灣學通訊》(新北)89(2015年9月)，頁8-9；楊秀芳，〈吳守禮教授與臺灣大學〉，《臺大校友雙月刊》(臺北)43(2006年1月)，頁15；黃典權、葉英、賴建銘纂修，《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臺南：臺南市政府，1979)，頁358-35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3月3日，網址：<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



## 引用書目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總督府府報》

《長崎泰益號文書》，典藏號：10931-1094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2254004、00000181001、00000221001、00000221007、00000432008、00004600020、00004590011、00004618026、00004921010、00004828016、00004860039、00004861005、00000904005、00004817001、00004866002、00001080012、00001298040、0000040300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10月5日，網址：<http://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識別號：T1011\_01\_010、T1011\_02\_004、T1011\_02\_011。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光緒三十二年重修長崎天后宮碑文〉，現藏於長崎唐人敷跡天后宮。

〈重修天壇碑記〉，現藏於天公壇內。

上野專一，《臺灣視察復命書》（1894年手稿本），第2號。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3月3日，網址：<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

顏義芳，〈煙草專賣初期被指定為元賣捌人的臺灣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132（2015年3月30日），下載日期：2020年9月30日，網址：<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32/1895>。

三井文庫（編）

2015 《史料が語る三井のあゆみ：越後屋から三井財閥》。東京：三井文庫。

大藏省理財局

1899 《臺灣經濟事情視察復命書》。東京：大藏省理財局。

川北幸壽

1902 《臺灣金融事情視察復命書》。臺北：臺灣銀行。

川北稔

2005 〈開かれた外交・閉じられた：コーヒーハウスからクラブへ〉，收於川北稔編，《結社のイギリス史：クラブから帝国まで》，頁237-252。東京：山川出版社。

中神長文（編）

1900 《臺南事情》。臺南：小出書店。

毛利敏彦

1986 〈大版商業講習所の誕生と福澤諭吉：大阪市立大学事始め〉，《近代日本研究》（東京）2：207-236。

王泰升

1997 《臺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史久龍（著）、方豪（校訂）

1976 〈憶臺雜記〉，《臺灣文獻》（臺北）26(4)/27(1): 1-23。

末武美佐

2017 〈產業獎勵的試行：1899年臺南縣農產物品評會〉，《臺灣文獻》（南投）68(4): 43-80。

伊藤泉美

1991 〈横浜華僑社会の形成〉，《横浜開港資料館紀要》（横濱）9: 1-23。

朱瑪瓏

2014 〈自由貿易、帝國與情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紀事報》中的臺灣知識〉，《漢學研究》（臺北）32(2): 49-82。

朱德蘭

1988 〈清康熙年間臺灣長崎貿易與國內商品流通關係〉，《東海大學歷史學報》（臺中）9: 55-72。

牟田豐

1896 《臺灣起業案内》。東京：交通學館。

吳文星

1992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呂紹理（撰）

2003 〈王雪農〉，收於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张仲礼

2003 〈略论旧中国外资企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收於张忠民、陆兴龙主編，《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頁18-30。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张忠民

2001 《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李力庸

2009 《米穀流通與臺灣社會（1895-1945）》。臺北：稻鄉出版社。

李方宸

2001 〈臺灣糖業鐵路經營之研究（1946-198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李佩蓁

2012 〈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國史研究通訊》（臺北）2: 43-49。

2013 〈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臺北）20(2): 31-76。

2015 〈國際貿易與臺灣糖商的轉型：以打狗陳福謙家族為例，1860-1905〉，《*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Respectives*》（萊頓）9: 54-72。

2020 《地方的視角：清末條約體制下臺灣商人的對策》。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李宗鐸

1995 《香港合約法和公司法》。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

李為楨

2015 〈日治初期臺灣地方金融組織法制化之前奏（1900-1912）：以信用組合為中心〉，《臺灣史學雜誌》（臺北）18: 3-38。

沈昱廷

- 2007 〈清代郊行研究：以北港資生號為例〉，收於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校，《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95-133。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

林玉茹

- 2000 《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聯經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6 〈略論十九世紀末變局下鹿港郊商的肆應與貿易：以許志湖家貿易文書為中心的介紹〉，收於林玉茹、劉序楓編，《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1895-1897）》，頁 32-5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07 〈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臺北）18(2): 61-102。
- 2009 〈潟湖、歷史記憶與王爺崇拜：以清代鯤身王信仰的擴散為例〉，《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3: 43-85。
- 2015 〈由「尺素頻通」看晚清寧波、泉州及臺灣的三角委託貿易〉，收於鄭永常主編，《東亞海域網絡與港市社會》，頁 459-485。臺南：里仁書局。
- 2016 〈通訊與貿易：十九世紀末臺灣和寧波郊商人的訊息傳遞〉，《臺大歷史學報》（臺北）58: 157-193。
- 2018 〈進口導向：十九世紀臺灣海產生產與消費〉，《臺灣史研究》（臺北）25(1): 39-100。
- 2019 〈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臺北）62: 1-51。

林玉茹（編）

- 2013 《尺素頻通：晚清寧波與泉州、臺灣之間的貿易文書》。臺北：政大出版社。

林滿紅

- 1997 《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波形昭一

- 1985 《日本植民地金融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姚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 1960 《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津川正幸

- 1972 〈五代友厚と堂島米商会所：明治 13 年 3 月，4 月限売買中止一件〉，《関西大学經濟論集》（吹田）22(1): 1-22。

香港公司註冊處

- 2013 〈香港公司註冊的歷史：研究報告〉。香港：香港公司註冊處。

宮崎健三（編輯）

- 1931 《陳中和翁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徐紹綱

- 2015 〈蘇有志：殞落的臺灣地方仕紳〉，《臺灣學通訊》（新北）89: 8-9。

高家龙

- 2003 〈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现状的三个挑战〉，收於張忠民、陸興龍主編，《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頁 6-1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高淑媛

- 2014 〈洋人生產機械化與臺灣糖業：以橫濱的打狗糖為例（1870-1895年）〉，《高雄文獻》（高雄）4(3): 7-25。

張守真

- 2011 〈「橫濱順和棧」產權轉承問題探討〉，《臺灣文獻》（南投）62(4): 367-392。

張守真、楊玉姿

- 2014 《陳中和新傳》。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

張宏謨

- 1992 〈早期臺灣傑出的糖界名人：板橋林家、陳中和、辜顯榮、王雪農〉，《臺灣風物》（臺北）42(4): 59-71。

張怡敏

- 2016 〈臺灣貯蓄銀行之設立及其發展（1899-1912年）：兼論臺灣史上首宗銀行合併案〉，《臺灣史研究》（臺北）23(1): 35-74。
- 2017 〈臺灣銀行股東構成之特徵與其意義（1899-1919）〉，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輯，《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83-505。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張麗芬

- 2013 〈食用到工業用：日治時期臺灣鹽業發展之變遷〉。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許丙丁

- 1959 〈當舖考源及臺南市質屋業〉，《臺南文化》（臺南）6(4): 26-30。

陳計堯

- 2019 〈人流、物流、金流：條約港體制下南臺灣與日本的經貿關係（1865-1895）〉，《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18: 7-67。

曾品滄

- 2012 〈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臺北）19(4): 1-47。

買威令 (Myers, W. W.) (著)、林滿紅 (譯)

- 1977 〈清末南部臺灣的蔗糖業〉，《臺灣文獻》（臺中）28(2): 137-142。

黃典權、葉英、賴建銘 (纂修)

- 1979 《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臺南：臺南市政府。

黃昭堂 (著)、廖為智 (譯)

- 2005 《「臺灣民主國」研究：臺灣獨立運動史的一斷章》。臺北：前衛出版社。

黃紹恆

- 1996 〈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臺灣人資本的動向〉，《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23: 83-146。
- 2010 《臺灣經濟史中的臺灣總督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紹恆

- 2013 〈日本植民統治初期（一八九五-一九一二）における三井物産台北支店及びその砂糖交易に関する一考察〉，收於馬場毅、許雪姬、謝國興、黃英哲編，《近代台湾の經濟社會の變遷：日本とのかわりをめぐって》，頁279-306。東京：東方書店。

黃智偉（主編）

2014 《美國駐臺領事館檔案輯成 1887-1941》，第 1 輯第 4 冊。臺北：悠傳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黃懷賢

2012 〈臺灣傳統商業團體臺南三郊的轉變（1760-194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玉姿

1988 〈清代打狗陳福謙家族的發展〉，《高市文獻》（高雄）1(2): 1-19。

楊秀芳

2006 〈吳守禮教授與臺灣大學〉，《臺大校友雙月刊》（臺北）43: 15-17。

臺南新報社（編）

1907 《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

趙祐志

2000 〈「順和棧」在橫濱（1864-1914）〉，《重高學報》（臺北）3: 193-211。

2011 〈日治時期高雄陳家的資本網絡分析：以企業經營與投資為中心〉，《臺灣文獻》（南投）62(4): 417-484。

劉序楓

2012 〈近代華南傳統社會中「公司」形態再考：由海上貿易到地方社會〉，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227-26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樋口弘

1956 《日本糖業史》。東京：味燈書屋。

鄭天凱

1995 《攻臺圖錄：臺灣史上最大一場戰爭》。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橋爪紳也

2006 〈俱樂部の成立〉，收於福田アジオ編，《結衆・結社の日本史》，頁 232-238。東京：山川出版社。

戴寶村

2008 《陳中和家族史：從糖業貿易到政經世界》。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臨時臺灣糖務局（編）

1903 《糖業記事（第 2 次）》。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1905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0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東京：三秀舍。

1909 《臺灣糖業舊慣一斑》。神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 3 卷下。東京：東洋印刷株式會社。

191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 3 卷下。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謝國興

- 2004 〈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鉄道・道路運輸業：朝鮮との初期的比較を兼ねて〉，收於堀和生、中村哲編著，《日本資本主義と朝鮮・台湾：帝國主義下の經濟變動》，頁229-260。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鍾淑敏

- 2018 〈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臺北）25(2): 97-143。

鷹取田一郎

- 1916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

Jarman, Robert L. (ed.)

- 1997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ume 4: 1886-1893*. Slauch, U. K: Archive Editions Limited.

## **Cross-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al Brokers: The Emergence of Wang Xuenong, the Richest Gentleman in Tainan during Regime Transition (1880-1905)**

Yu-ju Lin

### **ABSTRACT**

In Taiwan's sugar trad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e to consumer preferences, Anping sugar gradually came to be mostly exported to the region north of Central China, and Takow sugar to Japan. In the pas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whether these differences in sugar export destinations led Tainan and Takow's sugar merchants to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other peoples and on the world, and thus to have different responses to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ceding of Taiwan to Japan. Especially after the 1870s, the group of Takow merchants who personally went to Japan and Hong Kong to conduct cross-national trade transformed Taiwan's commercial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y are worth examining. Secondly, there is little scholar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iwan's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which in the early days of Japanese rule faced armed resistance by Han people and had to consolidate its dominance, and those Taiwanese businessmen who had experienced the Meiji Restoration firsthand. Furthermore, Taiwan is an island, and commercial trade has always been the locomo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how the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ideas of this group of transnational traders confronted the great changes of this era, changes in which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ere intertwined, remains to be studied. How they becam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rokers between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and local society, and then expanded their business territory and enhanced their social status are questions even more deserving of atten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amous sugar merchant Wang Xuenong, who traded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as an example. It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and why this sugar merchant, who had already traded in Japan as early as the Meiji Restoration, adopted different business strategies to expand his business territory and emerged as a

major figure of wealth and social status in Tainan at the time when Taiwan was ceded to Japan and many merchants and important clans fled back to China. First, it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choice of businessmen either to leave or to stay in Taiwan. Secondly, it demonstrates why Wang Xuenong chose to move from Takow to prefectural capital of Tainan (Fucheng), which was Taiwan's economic center and largest city, an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his career.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al brokering, it analyzes how he quickly became the richest gentleman in Tainan.

**Keywords:** Chen Zhonghe, Sugar Merchants, Dechang Company, Bank, *Sanjiao*, Network